

多面珍宝岛——沉淀了 40 年的真相

导语

1969 年 3 月 2 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几乎一夜之间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经过 40 年的沉淀，我们回首审视这场战争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对于这场战争的骤然爆发，苏联人同样惊诧莫名；原来苏联的核报复距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原来是我们喊了 20 年打倒口号的“美帝”阻止了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原来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珍宝岛反击战对于当时陷入全民狂热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1. 缘起：边境纠纷 OR 主义之争？

核心提示：“苏联老大哥”曾经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称呼之一，相同的意识形态曾是两国“牢不可破”的纽带。然而，在黑龙江的一个弹丸小岛上，“兄弟俩”兵戎相见了，“主义”带来的友谊最终也以“主义”的分歧告终，试问，谁能算是胜利者？

主义之争导致中苏两国渐行渐远

提示：1960 年至 1963 年，中苏这一对曾经的盟友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用武力扑灭“布拉格之春”的事件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 1965 年 3 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成。

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195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10 周年之际，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是否有必要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主动释放在押美国犯人等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尽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各自销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以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特别让中国方面如鲠在喉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界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偏袒印度；第二是赫鲁晓夫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的地步。但是，至少在多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根基还未发生动摇。陈毅在这一年 12 月 27 日所作的一个报告甚至特别告诫说：“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一个指头甚至是一个指头不到的分歧，进行挑拨离间，完全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的”。显然，根据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还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报告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指的是南斯拉夫。

1960 年 1 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反映出这种情况。考虑到中苏分歧已成事实，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做出说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理论问题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对照性资料。但是，中共中央明显地还不打算对中苏两党关系做出某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公布的资料没有刻意搜寻和罗列中苏之间的不同点，而是就所有能够想到的重要问题，全面对照了双方的看法。从对照的结果看，双方仍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会议印发的最足以说明两党分歧的资料，主要是中苏两党 1959 年 9 月围绕中印边界问题的来往信件和苏联政府“表示遗憾”的声明。不过，会议同时也根据周恩来建议印发了陈毅 1959 年 12 月 27 日的那个报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中苏分歧性质的看法，基本上

不出陈毅报告评价的范围。

1960年初进一步引起中苏交涉的仍旧是中印边界纠纷。1月19日，在得知苏联领导人即将访印的消息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要求大使转告苏共中央，苏联领导人访印时最好不要过问中印边界问题，以免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并暴露两党之间的分歧。22日苏联大使见陈毅时答复说，苏共中央已经表示，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会“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26日，周恩来再见苏联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提法表示惊讶，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中立，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都是一个新现象。这等于公开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他因此列举了五个事实表示中国的“担心和不安”。这包括1959年9月10日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国庆宴会上关于“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的说法，等。当然，在30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明确讲，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妨碍两党团结。

但2月4日，发生在华约国会议上的事件使问题迅速变得复杂化了。

2月4日，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中国观察员康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务必一面表示赞成普遍裁军，一面声明没有中国参加将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指示精神，说明中国方面的立场。此举引起苏方强烈不满。在当晚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在讲话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共，声称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作。“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

第二天，即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口头通知，更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通知同时批评康生2月4日的发言是错误的，说这实际上等于是冲着社会主义国家来的。

赫鲁晓夫的讲话明显是影射毛泽东的；而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更是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中苏两党分歧由此进一步升级。虽然直到3月上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周恩来、陈毅等继续在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却渐趋公开化。在2、3、4几个月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又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目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中共中央审定的文章仍多少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并不是修正主义者”，称他们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许多“不正确的想法”。

中共中央之所以决定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中印边界和对美政策这些具体问题，扩展到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方面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观点抱以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印度资产阶级头子尼赫鲁和美国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的软弱态度，更使毛泽东确信，苏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误区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

在。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谈话时公开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而“所谓社会主义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他指出，与苏联的这些分歧“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如（他们）不改变，我们就把所有可证明的文件都拿出来”。这时，毛一面继续肯定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一面却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把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称之为“半修正主义”了。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从1960年2月以来，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执，更多地发生在国际会场上。争论的焦点，也更多地转到裁军等关系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的意见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宣传和解释的工作，让各国党从上到下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观点。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包括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共中央理论观点的文章，和抓住一些有利的场合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工作。

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会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已经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参加会议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6月5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以邀请与会的20位外国工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介绍中方的观点。这一尝试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由于受到以苏联代表格里申为首的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

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做争取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苏共中央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向东欧国家兄弟党领导人进行游说。由彭真率领的前往出席6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这些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不久，很快就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一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乘罗党大会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与会期间，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考虑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已经发出多时，苏联党也于6月10、12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党，中共中央特别委托代表团设法与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在两党间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在罗党大会之前，中共代表团就于6月17日先行抵达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讨论。罗党大会进行过程中，代表团又在兄弟党开会前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但两次长谈的结果，不是使双方更加接近，反而使双方更多隔阂。

在与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以及在兄弟党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特别对中共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作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声称：“你们这样做，是否是在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呢？”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的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

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 84 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系统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和政策。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称：“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中共代表团虽然负有与苏联党当面交换意见的任务，但根据苏方当初的会议通知，代表团没有估计到在布加勒斯特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场面。尽管彭真唇枪舌剑，应付得体，事实上中共代表团已经处于被围攻的境地，极感被动。而赫鲁晓夫则颇为得计，言语中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比如，他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比如，他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称现代战争打起来，能活下来的人怕是也会因残废而死亡。又比如，他颇为傲慢地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的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十分强烈。中共中央也敏感地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但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作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中共中央起草的代表团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严格说来，布加勒斯特会议虽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也使中共中央意识到有组织地在兄弟党干部群众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震动较大。但中共中央尚未估计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中苏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同一个阵营里。应该说，两党关系不致出现较大变化。让中共中央深感意外的是，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不久，苏联方面就于 7 月 4 日和 16 日接连通知中共中央：停止在苏联出版发行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援华的苏联专家。而这两项严重决策的直接原因，都是基于苏联党对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向苏联国内群众和来华专家进行思想宣传的强烈反感与畏惧。21 日，苏联外交部破天荒地向中国驻苏代办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中方停止向苏联机关团体散发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宣传错误观点的发言和文章，并要求中方召回散发这些材料的人员。

撤退苏联专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科技、军工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对苏联的作法无疑极端反感，但他显然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只是轻蔑地批道：这“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很显然，也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困难，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 7 月 30 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 8 月 4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没有试图作出格外激烈的反应。会议明确地把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这一表现，限定在两党关系的范围内，强调它仍属部分分歧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在通知中，中共中央介绍了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分歧发展的历史，

但仍旧强调说，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分歧的关键主要只是在于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二人口要不要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关系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要不要不断革命、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整个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因素会日益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

“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苏冲突公开化，引起了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的严重不安。8月上旬，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到中国，直接前往北戴河，会见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共领导人。他明确讲，他此行是劝和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十年、八年以后，收获一定很大。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也经过一段时间。”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但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作法显然充满了愤慨。他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谈话中，毛泽东最重的一句话是：“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胡志明听后当场就用越语向随行的黄文欢、阮春水悄悄说：“这说法更重了”。

由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的判断无疑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注意到理论上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外，8月14日，周恩来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还明确主张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之所以会有这种估计，根本上是因为苏联早就曾经以类似的方法对付过不听话的南斯拉夫、波兰这些兄弟国家。而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在19日与从莫斯科回来的胡志明谈话中，周恩来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就得出印象说：“赫鲁晓夫主张全世界搞和缓，同美国的关系要和缓，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

不过，尽管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比之为中国的“右派”，甚至断言他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苏共和苏联的总体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

周恩来在8月14日回答一些人关于如何区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还明确讲：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的，搞社会主义的，讲国际主义的，所以目前的问题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

10天后，在向民主党派报告中苏关系现状时，他讲了大致相同的话，说明分歧主要是斯大林问题和战争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争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从两党两国关系和整个阵营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25日接见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仍旧强调说：中苏之间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在行动上我们两党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路线。28日，周恩来向各省统战部长说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时，更进一步肯定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问题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就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

了，两党两国关系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决不能因此造成反苏情绪。乌云总是要过去的。直到9月25日澳共总书记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苏联向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经济压力，比美国还坏时，毛泽东也还是表示说：“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估计，中共中央接受了胡志明的劝和和苏共中央提议，于9月15日派出以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但会谈从17日开始，一直开到21日，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接着，从10月2日到10月23日，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为准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而召开的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争论了三个星期，两党分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但即便如此，在10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仍旧一致决定由刘少奇率团去出席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有80个党的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张不放过这次正面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继续做争取两党团结的工作。会议决定，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成员包括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等四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刘宁一、廖承志、刘晓等三位书记处书记。同时从新华社、外交部、中联部抽调了相当数量的领导人和翻译来充任顾问和工作人员。会议甚至决定，这次会议如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目的，刘少奇就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访问苏联。毛泽东讲：81党会议上会有一番恶战，斗争可能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濒于破裂的边缘，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为此，斗争要讲策略，比如，刘少奇一般不要直接出面争论，位于二线，让邓小平和彭真站在第一线，如此便于转环。

刘少奇11月5日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亲往机场迎接。第二天刘拜访赫鲁晓夫时，谈到了会议开得好就准备正式访问苏联的问题，赫鲁晓夫格外重视，也大讲中苏团结的重要。强调说我们双方谁也离不开谁。7日举行红场阅兵和游行活动时，赫鲁晓夫又刻意让刘少奇首先登上列宁墓，并让刘少奇站在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中间。科兹洛夫报告时，也丝毫没有讲一句带刺的话。在大会开会前夕，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科兹洛夫和米高扬还专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理解赫鲁晓夫开幕式时在大会讲话的意图，说赫讲话的精神是强调团结的，不想挑起争论。米高扬甚至许诺说，一开完这次会议，他们马上就来与中国方面讨论苏中贸易、援助以及专家等问题，继续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考虑到苏联方面的态度，代表团曾经对是否改变原定发言基调问题进行过讨论。然而事实上，11月10日开幕式上赫鲁晓夫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仍旧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党的观点。这迫使中共代表团决定继续按照原定方针进行发言。根据原定方针，邓小平的发言将直接把矛头指向赫鲁晓夫。14日下午邓小平指名道姓地历数赫鲁晓夫和苏联党错误作法和错误观点的发言，迅速触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从邓小平发言后，接连几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卷入到争论中来了，中共代表团再度处于被围攻的境地。

11月16日晚，得到刘少奇电报的毛泽东召开会议，迅速研究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召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变，对会议声明必须坚持三条原则，即第一是坚持自己关于对战争要准备两手而不是一手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否则拒绝签字。为此，有必要做好破裂的思想准备。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打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也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讲，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不怕破裂。

激烈的争论一直进行到23日。这一天，赫鲁晓夫做第二次发言，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他一面继续肯定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是正确的，一面开始承认当时时间紧迫，对斯

大林的评价不尽全面；一面继续坚持说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面又反对说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一面继续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一面又承认要根本制止战争，只有靠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后，他还专门讲了一段要团结的话，反对争论不休，主张向前看，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互相让步。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天邓小平的发言也顺势降了温。

25日，起草委员会再度开会，彭真参加了起草会议声明的讨论。这一天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插曲。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挑头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呼吁团结。鉴于赫鲁晓夫有所让步，一些小党又强烈地反对分裂，主张团结，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后，当晚向中共中央请示，可否适度让步和妥协。代表团说明，目前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即处理兄弟党的原则；国际会议上解决分歧的办法；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宗派活动问题；所谓民族共产主义问题；是否应当在声明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问题；以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眼看会议即将结束，在有些问题上事实上苏方很难让步，如肯定二十大的问题，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苏方已显示出有松动和让步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味坚持以前的三条，不允许写上苏共二十大，破裂将不可避免；如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考虑到各小党团结的愿望，避免破裂，就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我们妥协的条件。

26日晚，毛泽东再度召集会议，商谈对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条件问题。会议没能取得一致的意见。27日，由于收不到中央的答复意见，中共代表团仍不得不坚持原有的立场，向各方表示，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不会在声明书上签字。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到了28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做出了决定，一致同意从原先的条件下再做让步。

中共中央28日夜里的指示电主要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当前观点正确，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的队伍还不巩固，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做好与赫鲁晓夫破裂的准备，几乎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各国党和从事革命运动的分子，都不原意看到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会议声明。第二，代表团应准备应付四种情况，一是把苏联党安在声明草案中的所有“钉子”，主要是苏共二十大问题、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统统拔掉，顺利签字；二是拔掉三个“钉子”，但苏共坚持要搞一个约束各党的内部协议，我们可以在声明上签字但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协议；三是保留有关二十大的内容，同时又搞内部协议，我们在坚持部分措辞修改后可以签字，同时声明反对内部协议；四是三个“钉子”不去，还要搞内部协议，则绝不签字。

多半也是因为担心破裂在即，这一天夜里12点，赫鲁晓夫专门找到胡志明，要胡志明以他个人的名义打电话，建议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到胡志明住处个别谈话，协商妥协的办法。当晚，胡志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给刘少奇打了电话，但遭到中共代表团拒绝。不过，中共代表团当晚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做出了决定，争取以保留二十大的内容为让步条件，促使苏方让步，取消声明中所谓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提法。

29日，根据前晚的决定，彭真利用在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机会，约科兹洛夫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彭真当场问科兹洛夫：你们是不是想破裂？科明确答复：不是。彭于是亮出底牌，提出中方妥协四条件，即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协议；第二，声明中不能写有所谓反对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内容；第三，要写上在国际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我们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措辞要修改。对此，科兹洛夫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临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科兹洛夫转达的中方的妥协条件。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通知彭真，苏共中央已基本同意了中方的条件，但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一次正式会谈。

30日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按照约定在列宁山顺利地举行了会谈，基本上按照中方的条件达成了妥协。于是，赫鲁晓夫正式向刘少奇发

出访苏邀请，双方会毕还高兴地一起合了影。

第二天，即12月1日，在激烈争吵了将近三周，多数党都认为中苏破裂不可避免之后，莫斯科会议在一片团结声中落下了帷幕。在为庆祝莫斯科大会成功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应邀坐在主宾席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与他们频频祝酒，气氛热烈。

这个结果显然也让毛泽东感到满意。12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刚刚回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以及接见路过北京的胡志明时，一再对这一结果表示高度赞赏。12月9日，毛泽东又亲率政治局成员前往机场迎接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顺利归来的刘少奇一行。直到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仍旧明确讲：这次81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讲团结，跟苏联、跟社会主义国家、跟兄弟党都要讲团结。就是骂过我们的党，也还是要和它讲团结。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斗争—团结。刘少奇也在会上讲：经过这次斗争过后，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都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

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当2月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提出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还特别复信苏共中央，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7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作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但是，在1961年，仍旧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从苏联撤出阿海军基地并撤走一切人员，到最后宣布断绝与阿的外交关系；二是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很难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一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不仅在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同时还亲率中共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更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词的文章和信件。

尽管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开始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但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会后与路过北京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失望与愤懑。毛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他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1962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事件。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出现相互指责的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6月21日，毛泽

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作法有关，也与他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还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作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个工作中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在农村主张“包产到户”，在外交上主张搞缓和，在党内主张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他开始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7—8 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几度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理解赫鲁晓夫现象。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但能不能说苏联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了呢？毛泽东还讲不出这种话来。他还只能举南斯拉夫的例子，说：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

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怀疑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总是采取守势，更担心由于态度不鲜明会加剧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1962 年 8 月，当毛泽东得知朝鲜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疑义，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主张。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连续发生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的严重情况。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当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一事发生后，《人民日报》开始受命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 1963 年 2 月 15 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爷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吵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作法，说 1962 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2 月 21 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 日，

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年科。他说，赫鲁晓夫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自己又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与此同时，针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但对此一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为了解一些兄弟党可能的反映，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多数意见均对文件表示赞赏。当毛泽东询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说：“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时，这位新共总书记当场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只有越南党的领导人主张应多加点糖，少些辣椒。

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6月14日公开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映可想而知。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此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

7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会谈后，毛泽东已经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九评”。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再度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经过了一连串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现在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争论很难再停下来了。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

2. 经过：中国人熟知的珍宝岛事件

中苏“珍宝岛事件”始末

核心提示：很难说在当前的时代，有多少人还记得四十年前在珍宝岛发生的这场战争，即使有不少人曾经听闻其名，对于细节也是知之不详，但是，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用血肉之躯抵挡了苏联坦克、装甲车的侵略，则是一致的认识。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提示：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反击战是一场真正的血肉与钢铁的搏斗，战斗异常残酷激烈。我军使用约一个营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苏军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和一个步兵

加强团激战近9个小时，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主权。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部署了百万大军，一直到80年代初期。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 1959 年的西藏叛乱；1959 年 8 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 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 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 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 67000 人逃往苏联；1963 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 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 1965 年 3 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 1958 年 8 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 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

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此，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分歧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

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68页。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的产生而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是为序。

战斗英雄亲历：我看到的珍宝岛第一枪

提示：3月2日8时40分，边防站站长沙玉国带领巡逻组上岛，苏军也派出70余名军人分两路上岛，一路直扑孙玉国巡逻组，另一路却从岛侧悄悄向孙玉国巡逻组身后迂回，欲成合围之势。9时许，迂回的苏军突然遇到在岛上待命的我军，立即开了枪。我军见苏军先开了枪，才开枪还击。

亲历者讲述珍宝岛保卫战鲜为人知细节

今年是珍宝岛保卫战35周年，当年历经过中苏边境战火的大连市林业局原副局长于洪东向记者回忆了难忘的岁月珍宝岛保卫战的一段细节。

于洪东，当年参加珍宝岛保卫战的某部排长，战后被沈阳军区记一等功，后任河南省鹤壁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转业后回大连任

市林业局副局长，2001年退休。近日，他在家中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珍宝岛保卫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珍宝岛自古是我领土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与中国大陆分离，

形成江中小岛，至今在枯水期间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徒步上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珍宝岛生产和捕鱼。上世纪初，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老人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又称“张盖岛”和“翁岛”。1928年起，中国居民陈远进与其儿子常住岛上。1945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

谁打响了珍宝岛战斗第一枪？

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方入侵珍宝岛16次，伤我军民。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中国边民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冰上捕鱼，苏军上前干涉，我边防部队闻讯赶来保护边民。苏军拳打棍击我方军民和鸣枪威胁，我方也以棍棒进行还击，我方伤100多人，苏军伤10人左右。1968年1月5日，苏军又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5人。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提出“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并强调：只有苏方开枪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才可以开枪自卫还击。1969年3月2日凌晨，我军上珍宝岛待命，如苏方武力干涉我方巡逻，将视情况给予支援。于洪东当时是排长，上岛待命就有他率领的排，珍宝岛战斗英雄于庆阳就是这个排的战士。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战斗。前苏联军人的文章在回忆这场战斗时说：当苏军接近珍宝岛时，“……突然，他们遭到（中方）正面机枪扫射，左岸（中方）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阵亡……”这显然是说，中国打响了珍宝岛战斗第一枪。而中国国内当时所有关于珍宝岛战斗“第一枪”的报道，对当时“第一枪”的细节都没说清楚。据于洪东回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3月2日8时40分，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巡逻组上岛，苏军也派出70余名军人分两路上岛，一路直扑孙玉国巡逻组，另一路却从岛侧悄悄向孙玉国巡逻组身后迂回，欲成合围之势。9时许，迂回的苏军突然遇到在岛上待命的我军，立即开了枪，我方几名军人中弹倒地。我军见苏军先开了枪，才开枪还击。正在向苏军口头抗议的孙玉国听到枪声，知道战斗已经打响，立即率队参加战斗。对面苏军的“瘸子上尉”听到枪声后正要拔枪，被手疾眼快的我军战士开枪击毙。后来得知，此时远东苏军指挥机构已下令：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由此可见，苏军先开枪不是偶然的。而前苏联政府在后来的声明中也把中方的反击歪曲为已有准备的“突然开火”和伏击，根本不符合事实。

列昂诺夫上校是怎么死的？

珍宝岛战斗后，前苏联国内曾大肆宣传两个“英雄”：在珍宝岛战斗中被打死的“瘸子上尉”和列昂诺夫上校。列昂诺夫上校是珍宝岛战斗的苏军前线指挥官，据前苏联军人文章回忆：列昂诺夫上校是身先士卒，坐在坦克里冲锋，坦克被炸毁后，他从坦克里爬出来，被我方狙击手击中身亡。我国国内也大多这样报道，并且都说是于洪东击毙的。于洪东却说：列昂诺夫上校不是他打死的。他打死的是个上尉。1969年3月15日9时46分，珍宝岛第二次战斗打响。一辆苏军坦克驶入我方雷区被炸毁，于洪东带领战士冲上去，看见炸毁的坦克底下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于洪东起先以为是堆盖坦克的帆布，就没在意。等冲到跟前，才发现是个苏联军人正在拉枪栓，于洪东手起一枪，将其击毙。战后我方打扫战场时才发现，这个苏军穿的是上尉军衔的军服。战后我方将这具尸体交还给苏方，却不知怎么变成了上校。后来于洪东和战友们分析：3月15日的战斗中，苏军猛烈炮击我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并再次入侵珍宝岛。我方以炮火回击，并对被判断为苏军前线指挥所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列昂诺夫上校作为前线指挥官，如果真是在珍宝岛战斗中死的，此时很可能就在这个指挥所，被同时炸死。

珍宝岛亲历记：中国一个营击败苏军一个加强团

提示：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准备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曹建华趁敌人被打懵的机会带领部队猛扑过去，一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各路反击部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珍宝岛亲历记：中国一个营击败苏军一个加强团

37年前的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面对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国边防军人毫不畏惧，奋勇作战，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前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事件”）。现已80高龄的曹建华老人曾亲历这场战争，事隔37年他为我们讲述了那难忘的1969年3月……

苏联不断在边境向中国施压

这次战斗，是在中国“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取得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苏联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并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国边民，劫持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崇尚斗争哲学的毛

泽东主席绝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斗争。

边境冲突形势严峻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前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9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为此我方据理力争，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拳脚毆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方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方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气焰十分嚣张。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曹建华的小车车胎全部被打扁，操纵系统被击毁，车辆完全报废。群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开枪的苏联边防军包围起来，混乱中双方开始动手厮打。一苏军士兵在装甲车上架起机枪向曹建华瞄准射击，此时一位老渔工奋力甩出手中的渔叉将机枪撞飞……第二天，就袭击事件我方向苏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苏方拒不认账。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苏军连续出动兵力干涉我边民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从事冰上捕鱼生产，中国边防部队前来保护群众，由于我方力量较弱（每次都是5到6人围打我方1人）屡次被围殴打，竟有100多个群众和边防部队官兵被打伤，有的被打昏过去，许多战士头破血流，而苏方只有10人受伤。

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对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冲撞，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回忆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却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

同时，在中苏边境向我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与七里沁岛相距20公里，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19世纪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汉子后才形成岛屿。

1960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1968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我方虽给予还击，终因人少力单，屡次吃亏。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然而，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方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方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曹建华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13辆车。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正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接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4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其实敌情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三十多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时坚持不到40分钟，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战士们竟然能在雪里呆上6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打响第一次遭遇战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了第一个作战命令。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的部队；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一队人马公开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

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摸上岛，找到了岛南端可潜伏部队的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药；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搏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早上6点多钟，突然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8时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

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流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 12 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敌人第一路 24 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 9 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100 多米处登岛；第三路 7 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

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苏军今天头戴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方包围过来。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准备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

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向敌人倾泻过去，敌人一下被打懵了。曹建华趁机带领部队猛扑过去，一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各路反击部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3 月 2 日可以说是在我军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次遭遇战。从 9 时 17 分打响，至 10 时 30 分结束，历时近一个半小时。歼敌 56 人，其中击毙 48 人，击伤 8 人，击毁敌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缴获冲锋枪 14 支，手枪两支，子弹和其他器材一部。我方伤亡 54 人（亡 20 人，重伤 8 人，轻伤 26 人）。战斗得手后，曹建华迅速组织部队撤出了战斗。

3 月 2 日战斗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3 月 9 日，沈阳军区全面接管前进指挥所，曹建华在作战组任副组长。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曹建华与其他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按原方案，下一步作战重点放在距珍宝岛 20 公里外的七里沁岛。上级的意图是：自 1966 年以来敌人多次入侵该岛并制造多起严重流血事件，是敌我边界斗争的焦点，在此反击政治意义重大；1968 年 3 月我军曾在该岛进行过反击准备，甚至还派出侦察分队上岛潜伏；我方地形视野开阔、道路状况较好，便于防御和部队展开，是个较理想的歼敌场所。

曹建华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七里沁岛苏方江岸多为 90 度峭壁，不利于敌装甲车机动，在这种复杂地形下作战，敌人会百倍警惕，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珍宝岛却存在战机：3 月 2 日战斗后，敌方在该地区调动频繁，大有报一箭之仇之心态，珍宝岛沿江地势平缓，上冻后，敌装甲坦克可直接上岛。敌对岛上地形熟悉，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只要部署得当仍可取得战果。

尽管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有人却不以为然。曹建华据理力争，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无奈之下，只能请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做决断。肖副司令听了曹建华的分析后认为有道理，立刻开会复议，上级批准了他的方案。当时珍宝岛地区有大小 13 个作战单位，尽管曹建华职务较低，由于他最熟悉情况，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珍宝岛方向总指挥。

事实证明曹建华的判断。3 月 2 日战斗后，苏军增加兵力，多次对珍宝岛进行袭扰。他意识到，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根据苏军作战特点，我军很可能面临与苏军大规模装甲坦克的对抗。于是，曹建华提出迅速在我方江汉布雷；加强前沿反坦克兵器；火炮位置要靠前，以提高反坦克效果。

残酷的血肉之争

3 月 14 日，西北风卷着小雪，24 点，三辆苏军坦克入侵我珍宝岛，从我方江汉的北口进，南口出。敌人的挑衅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到来。曹建华紧急调动部队，并在凌晨 2 点派出一个班上岛监视敌人，掩护我军登岛巡逻。但珍宝岛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太恶劣了，沟深、沼泽遍地，道路泥泞不堪，炮兵上不来，部队展不开。

3 月 15 日凌晨，风停雪住。2 点时苏军二十多辆装甲车闭灯前行，从珍宝岛北端登岛并进入树林隐蔽。同时苏边防军 6 辆装甲车载着三十余名步兵趁夜悄悄从珍宝岛西北端入侵，企图天亮后偷袭我巡逻队。我军观察哨发现情况，使用高音广播发出警告，令其退出我

国领土，苏军随即潜伏在丛林中。

上午7时47分，曹建华命令营长冷鹏飞带步兵排和一个火箭筒班，孙玉国带一个步兵班，分两路登岛并迅速向土堤靠拢，与敌人形成对峙。同时调一个步兵连前出江边，准备登岛。

8时02分，入侵之敌以装甲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我军猛烈射击，步兵在6辆装甲车掩护下向我守岛部队进攻。

曹建华指挥我岸边所有82迫击炮向敌装甲车开火，支援上岛部队。冷鹏飞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以猛烈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同时指挥40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打击装甲车。这时敌三十余人迂回到冷鹏飞侧后偷袭，我方潜伏在左侧的警戒小组趁机开火猛击，毙伤敌人十余人。经过一小时激战，毙伤敌20余人，击毁装甲车2辆。9时16分敌人逃窜，我军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之后，我军利用战斗间隙补充弹药、巩固阵地，并要求上级增援炮兵，做好敌人再次进攻准备。9时40分，苏军地面炮兵和坦克对我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接着又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进攻。其中4辆坦克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汉，迂回到我守岛分队侧后。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岛北端我军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前后夹击中国守岛分队。苏军大口径火炮和高射机枪火力同时封锁了江汉，拦阻中国部队上岛支援。

曹建华当即命令岛上南北两路分队迅速靠拢占领土堤一线，同时派出民兵上岛输送弹药，集中兵力和反坦克武器抗击正面进攻之敌，并命令七五炮班长杨林率两个无后座力炮班上岛支援战斗。

杨林马上率两个班冲进被炮火封锁的江汉，发现4辆坦克成纵队高速驶来，便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机，待坦克驶近十余米远时，他们突然跃起，接连投出5枚反坦克手雷炸乱了苏军坦克队形并就势开炮，先头一辆T-62坦克中弹后闯入我军雷区，右侧履带被炸断。另外3辆坦克夺路逃窜，杨林命令在冰面上架炮跟踪射击，击伤掉在后面的一辆坦克。随后杨林带领两个班继续向岛内跃进。苏军2辆装甲车向他们冲来，杨林操炮开火击毁一辆，另一辆掉头逃窜，杨林操炮追射又将其击毁。

敌人除用大口径炮拦阻轰击我增援部队外，还以两架战斗机和一架直升飞机轮番俯冲盘旋，冷鹏飞中弹负伤，曹建华命孙玉国接替指挥。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打垮了敌人第二次进攻。

13时35分，苏军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兵侦察校射飞机引导下，对我军防御阵地和边防站进行大规模炮火袭击，持续时间达两小时。紧接着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第三次猛攻。他们向我防御阵地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中国守军赶出珍宝岛。

15时30分曹建华命令我增援的反坦克武器上岛增援，此时岛上已集中了15具40火箭筒和7门75无后座力炮。我军敢于近战接敌，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围打1辆坦克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

曹建华回忆说，那是一场真正的血肉与钢铁的搏斗，战斗异常残酷激烈。苏军猛烈的炮火把小岛炸得体无完肤，浓烟包裹着火团，爆炸的气浪将岩石般坚硬的冻土掀向天空，然后又像冰雹一般劈里啪拉地砸下来，巨大的爆炸和灼热的弹雨使整个小岛仿佛在燃烧；机枪喷射，铁甲奔突，手雷飞舞；双方士兵凄厉地喊叫，坦克装甲车打着加力，车屁股喷着浓浓的黑烟吼叫着在沼泽中挣扎，炮弹和装甲撞击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我军越战越勇，粉碎了敌人第三次进攻。

3月15日这一天，我军使用约一个营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苏军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和一个步兵加强团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3次进攻，击毁敌

坦克 2 辆，装甲车 7 辆，击伤 4 辆，毙伤敌 60 余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主权。

珍宝岛反击战的胜利，使一向不为任何势力屈服的毛泽东主席极为兴奋。在紧接下来 4 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战斗英雄孙玉国代表边防部队在大会上汇报我军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苏修作斗争的经过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全场代表无比振奋。党的“九大”开成了一个团结起来准备战斗、抵御外侵的大会。

珍宝岛牵动了世界

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建国后的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中越）相比，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这一事件的战略意义之大，耗费之多，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较量。军事评论家认为，珍宝岛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停战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在外交关系上，对中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至少保持中立。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通过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 25 万美军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勃列日涅夫气得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却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

1969 年 9 月 23 日和 29 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 2 万至 2.5 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为 300 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随后中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 1 号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中美加紧了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改变敌对立场，加快了建交步伐；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虽有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曹建华仍继续履行着保卫国家的责任，他动用有限资金将防区内低矮潮湿的藏身洞建成了钢筋水泥的永备工事……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37 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这段历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老将军曾说：“对于这场 30 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们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总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地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

珍宝岛反击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应该看到，这一斗争的本质仍是中国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

主义行径的行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主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国家主权事关国家利益，共产党人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经过中国坚决的斗争和长期谈判，苏联方面后来采取了比较理智的态度，逐步解决了中苏边界问题。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该协定继续得到俄罗斯的承认。

如今的珍宝岛，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阳光下，满目苍翠中跃动着中国边防军人的身影，滔滔的乌苏里江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江那边，昔日的敌人已成为今日的盟友，并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江这边，当年曾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们都已年逾花甲。他们偶尔相聚，追思过去，续写着战友情谊。

事隔37年，今天我们更明白和平环境的重要性：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和平的环境，但和平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必须用经济、军事实力来保卫。

3 分歧：苏联人眼中的珍宝岛事件

核心提示：与中国人对于珍宝岛事件细节，更多着眼于血肉之躯打坦克的悲壮、英勇大同小异，苏联亲历者的回忆中，也有类似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只不过正义者仍是己方，而挑起冲突的则变成了蓄谋已久的中国军队。

葛罗米柯与中苏珍宝岛冲突：称苏联是理亏的

提示：时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非常务实的认为“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是不值得的，在珍宝岛问题上，苏联是理亏的，中国政府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历史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的，现在我们又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是理亏的，这一点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时，时任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的务实主张，客观上为两国缓解冲突、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议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世界第一号大国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国内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国内财政紧张，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地位削弱。而苏联则不同，新一代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个个雄心勃勃，他们决心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一争高低，世界局势正变成美国与苏联左右下的两极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候，葛罗米柯成为苏联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最主要的演员之一，与美国的基辛格一起成为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外交战略家。

1964年底的一天，苏联高级领导层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新的领导班子的宏伟计划就要在这次绝密会议中讨论通过了，葛罗米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勃列日涅夫用手指着地图说：“现在，美国的势力在全球已基本稳定，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洲、亚洲东部、东南亚各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整个西欧，美国以这些地区为基础，仍在不断扩张势力，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他接着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苏联如何与美国在全世界竞争。”勃列日涅夫的话简洁明确。他的话刚完，大家纷纷议论起来。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国防部长，他认为，欧洲是重点，他说：“欧洲是苏联近邻，美国的主要力量也在欧洲，谁能控制欧洲，谁就可能取得主动地位，因此，我认为，苏联要在欧洲与美国一争高低。”勃列日涅夫的亚洲事务方面负责人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欧洲现在力量已达到均衡，苏联或美国无论是谁想把对方赶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也都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在亚洲事务中，苏联倒是还有机会扩大势力的。特别是中国……”

当他说到“中国”二字时，葛罗米柯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的脸色，见到勃列日

涅夫轻轻地摇摇头，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不抱什么希望，于是他说：“中国正在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对此我们要有警惕。”他心中的话未敢说出来。

讨论在激烈地进行，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望了望正紧皱眉头的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暗示，他明白领袖的意思是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葛罗米柯冷静沉着，论据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在欧洲，我们已经和美国较量了许多年，现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大国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都已作出了选择，如果苏联再在这些国家上下功夫，把它们从亲美变成亲苏，恐怕非常困难。”他接着说：“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这些国家占据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面积和大部分资源、人口，更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世界的交通要道，因此，苏联应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特别是向中东和非洲发展，一旦苏联在这些广大地区拥有主动权，美国的势力就必将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葛罗米柯见地独特的一番话给大家一个震惊，一时间会场沉静下来，因为，谁也难以对他的话作出什么评论。这时，突然有人鼓起掌来，表示支持他的发言，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毋庸置疑，此时也只有最高领导敢为葛罗米柯的讲话下一个结论，而这掌声就是最好的结论。

也许，正是葛罗米柯的意见，奠定了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地缘战略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对葛罗米柯的发言非常欣赏，认为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是经过分析和思考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他在会后再一次与葛罗米柯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葛罗米柯视为朋友，而不是下级，所以，他们的谈话没有什么顾忌。他们不仅谈了如何向第三世界渗透，还谈到了亚、非、拉各国的具体情况，葛罗米柯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和独有的外交家敏感，以及他多年对各国国情和政策的深刻了解和思索，向勃列日涅夫谈了他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并分析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好前景，勃列日涅夫听得非常耐心和入神。

提出通过军事援助向第三世界渗透

当勃列日涅夫谈到苏联向第三世界扩大势力的方法时，他毫不掩饰地向葛罗米柯谈到他内心的顾虑——有些力不从心。他说：“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贫穷落后，苏联虽然可以从经济上援助它们，但是苏联自己经济也不景气，不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样财大气粗，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每个国家即使送一点，加起来也是一个庞大难支的数字。”他又问葛罗米柯道：“葛罗米柯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葛罗米柯说：“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只有得到利益时，他才能倒向给他利益的一边。但是，经济援助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非常赞同葛罗米柯的分析，认为政治策略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他高度赞扬葛罗米柯的谈话。他说：“好！葛罗米柯同志，你的分析很切合实际，也特别适合于我们苏联。”

葛罗米柯笑着说：“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教会我的。我在美国期间，发现美国人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从不以宗教信仰来分辨朋友还是敌人，只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只要对美国有利的事，他们就干。凡是对美国不利的东西，他们就不干。”

他接着说：“军事援助是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佳途径，可以事半功倍，一举多得。首先通过军事援助，可以加强苏联与被援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使它们依靠苏联；第二，通过军事援助，苏联可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培养亲苏的军人，让他们为苏联服务；第三，一旦将来这些军人发动政变，这个国家的政权自然就是亲苏的了。”勃列日涅夫听了葛罗米柯的分析十分欣慰，认为他的看法十分精彩，很有创意。他当场拍板说：“好！下一步我们就从军事援助入手，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我们的力量。明天，葛罗米柯同志，就由你们外交部和国防部牵头，组建一个军事援助机构，立即开展工作。”自那以后，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间进

行了广泛的渗透与发展。在战略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均获益不浅。

珍宝岛冲突，使葛罗米柯外交努力受阻

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葛罗米柯作为有资历的外交官和元首的重要幕僚，所采取的态度应该说是公正的，他承认苏联在珍宝岛问题是理亏的。他还说过去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正当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之时，他对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战略性建议。他说，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与中国交恶，只能将中国推向美国，对苏联不利。

1969年初，中苏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珍宝岛有可能成为双方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在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已承认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可1969年3月，苏联声称珍宝岛属于苏联。3月2日，苏联军队公然出动武装部队占领了珍宝岛。中苏之间的关系恶化至顶点，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葛罗米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因为就在前两天苏联的一次内部高级会议上，葛罗米柯针对当时中苏之间的形势说：“中苏是近邻，与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将是苏联受害，两国间的矛盾还是要立足于谈判。”他还说，“当前苏联的主要对手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但是，他的看法没有占上风。

在3月2日之后的连续几天里，中苏双方的军事对抗仍在进行，葛罗米柯的外交活动遇到巨大阻力。他通过外交渠道获知，中国方面对苏联出动军队反应异常强烈，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挤满了示威群众。葛罗米柯深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再也坐不住了。3月8日下午，他请求与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也处在矛盾之中，他也很想听听葛罗米柯的意见，但由于当时他正参加世界妇女节集会，两人未能见面。

3月11日，葛罗米柯被通知去见勃列日涅夫。他们一见面，勃列日涅夫就开门见山地说：“葛罗米柯同志，谈谈你的想法吧。”葛罗米柯犹豫了片刻说：“现在苏联的目标是同美国全面竞争，美国是苏联的敌人，而中国不是。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但是，苏联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有两个主要敌人。”

勃列日涅夫边听边点头，葛罗米柯也就越讲越轻松了，他继续说：“中苏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矛盾，中国不是苏联走向世界的阻力，因为中国现在还没这个能力，两国矛盾的起源是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修正主义者的争论，关键是中国想从苏联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长期受制于苏联的。”显然，葛罗米柯看问题的眼光比较现实。事实上，中苏两国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开始了。但这种论战可说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忍受苏共的“老子党”作风了。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共一向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卒”，对中国指手画脚，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不断强大，中国对苏联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法就无法容忍了。

葛罗米柯认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情绪主义的错误，完全是从保全自己的面子出发，结果却丢尽了面子。然而，葛罗米柯面对的是苏联的头号人物、性格主观独断的勃列日涅夫。所以他不可将心中的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只能用十分婉转含蓄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是不值得的，两国在没有冲突之前，还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发生流血事件，两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在珍宝岛问题上，苏联是理亏的，中国政府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历史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了的，现在我们又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是理亏的，这一点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勃列日涅夫开始时还觉得不以为然，可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听着听着，他猛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葛罗米柯同志，你的任务不是分清珍宝岛是谁的，而是在外交斗争中向中国表示，珍宝岛是属于苏联的。”

葛罗米柯的主张最终被采纳

至此，葛罗米柯只好住了嘴。可以说，葛罗米柯在珍宝岛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是尊重事实

的，也是比较公道的。在后来由他主编的《外交辞典》中明确地说：19世纪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中苏边境的划界应以国际惯例为准，珍宝岛属于中国。

葛罗米柯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出发，站在战略高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这样做最大的损失并不在于同中国关系恶化，而在于把中国推向美国一边，使美国的势力强大起来，现在苏美关系正处于一个交叉路口，谁得到更多的国际力量支持，谁就会占优势，我们一旦抓不住这个机会，使美国在外交上占主动，那么，整个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

葛罗米柯的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时也击中了勃列日涅夫的痛处，他又一次站起来，点着了一支雪茄，在屋内走来走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葛罗米柯心中又急又怕，急的是勃列日涅夫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尽快作理智的回答，怕的是自己的一番话会惹这个“新沙皇”大发脾气。

勃列日涅夫毕竟还是一个大国的元首，他抽完一支烟，亲切地看着葛罗米柯说：“这样吧，今晚找柯西金同志再开一个会，研究研究如何使这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听完这句话后，葛罗米柯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他毕竞争取了时间，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苏联领导人后来进行了反复、认真、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月12日由柯西金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要求。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3月29日，苏联政府又发了一个措词温和的照会，说：“……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这个岛……”这是一个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问题了。

前苏联上校回忆：“珍宝岛事件”始末

我们（苏联）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2月底的时候，中国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2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进入达曼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

核心提示：珍宝岛是乌苏里江里的一个小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岛上有一些灌木，有几条河流从中国一侧流入该岛，像手掌一样。当年围绕该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历史的亲历者，一名俄罗斯上校回忆了这一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达曼斯基岛（珍宝岛）疑团

1969年3月，在远东乌苏里江的这次战斗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边境最大的战斗行动。对此，多年来在俄罗斯存在种种猜测，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当时苏联人并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占领该岛，并问道：“当中国人进入该岛时，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太多，边防军根本就无法对付他们，不得不动用正规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30年前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后来苏联政府也有意让人们淡忘此事，也只是将这次冲突描述为《1969年3月的乌苏里江事件》。

90年代初，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到“达曼斯基岛”了，于是俄罗斯人又开始猜测，开始议论当年的“秘密坦克”、议论关于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说“该岛已不复存在，为了让谁也得不到它，我们已将它炸毁”。达曼斯基岛事件仍是一片疑团。曾当过伊曼边防总队队长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诺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详尽的描述。

摩擦由小到大

据康斯坦丁诺夫回忆：1968 年秋，我们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发起挑衅行动。我、列昂诺夫和当时的边防总队参谋长巴甫洛夫一致认为，这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冰上以拳相向，而是实质性的冲突。我们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命令是：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不能让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官兵们传播这里发生的事情、争斗。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国内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正当党的领导人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漫长的中苏边界，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几年来两个大国的士兵经常发生打斗。

1968 年只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 40 次打斗。1968 年 11 月的一天，边防总队指挥部曾向军区报告说：“有可能发生武装挑衅，请求具体的书面指示，并加强力量”。

一周后，边防总队司令和政委被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对他们说：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但只是口头意见，不能作为依据。

在相邻的基尔金岛上也一直有一些小摩擦。1969 年 1—2 月在达曼斯基岛、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是用棍棒，而是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 15 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如果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一定会发生在这里。

达曼斯基岛和相邻边防队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哨所值勤人员都加强到了 50 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只要中国人一出现，我们的边防人员就向他们射击，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

我们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 2 月底的时候，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 月 2 日夜，约 300 名中国军人进入达曼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

从最近的观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 80 米，为什么边防侦察分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而中国人的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边防分队早晨沿达曼斯基岛巡逻时也没有发现可疑迹象，我们就从中国人的鼻子底下过去，他们也没有惊动我们，也许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

3 月 2 日行动

康斯坦丁诺夫说：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事首长足智多谋、训练有素、十分狡猾，选择 3 月 2 日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宣传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一天非同寻常。

第一，3 月 1 日晚至 2 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这使中国人可以悄悄地占领达曼斯基岛，雪可以掩盖他们行进的痕迹。

第二，3 月 2 日是北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中国人估计可能会有人请边防总队指挥部的人去吃饭或联欢，造成和指挥所的联系“不畅”。的确如此，边防总队的领导去了维也坚斯卡亚村，很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参加联欢会，而是去参加演习。30 年来没有人提起过演习的事。

实际上，事发前 3 天，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两个师参加，军区指示由边防总队扮演“敌军”。难道 2 个师抽不出来 2 个连扮演“敌军”，而非要边防总队去扮演“敌军”吗？可能当时军区司令部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

第三，周日和周六，我们的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

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官可能正是根据上述因素，才选定在这一天开始行动的。另外，我们在演习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坦克团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宣布进行战术停顿。中午 12 点以后，康斯坦丁诺夫返回指挥所，演习指挥部里响起了“焦急”的电话铃声，远东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来说：在下米哈依洛夫卡哨所，正在进行战斗，有人员伤亡。列昂诺夫

马上下令给巴甫洛夫，让参加演习的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马上撤下，向达曼斯基岛出发。

事情就是这样，当达曼斯基岛两个哨所发生流血冲突时，整个预备队，即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却在离该岛 100 公里以外的地方。

硝烟笼罩达曼斯基岛根据康斯坦丁诺夫的回忆，1969 年 3 月 2 日技术观察站报告，发现有两个小队、约 30 名中国人已经进入苏联边界。上午 11 时左右，边防哨所的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一个由 30 人组成的小组，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两辆汽车去迎击中国

他们决定从两面包围该岛，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 5 名边防军人和克格勃特别处派来的侦察员 H·布依涅维奇上尉从正面接近该岛。他们后面约 300 米是第二小组，由巴班斯基下士率领，共 12 人。第三小组由拉伯维奇中士率领，共 13 人，从侧翼接近该岛。突然，他们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阵亡，巴班斯基中士带领的人占领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并进行还击。相邻哨所的摩托化机动小组赶去支援，带队的是维塔利亚·布别宁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取得成功。

参加演习的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在苏哈诺夫斯基峡口直升机追上了他们，机动分队转乘直升机火速赶往达曼斯基岛，周围一片硝烟，灌木、土地、装备都处在火光中。观察达曼斯基岛，在一颗树旁发现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人降落了。同时，装甲运兵车也来了，是斯克拉达纽卡军士学校的人。我们占领了达曼斯基岛，开始派人去找伤员。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挥的巴班斯基中士爬过来告诉我们，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小组，全部阵亡。

列兵彼得罗夫是从边防总队政治处来的，在他的短大衣下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死前拍摄的最后 3 张照片。我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看到，当斯特列利尼科夫正带人接近时，一个中国军人举起手，明显是向埋伏在战壕里的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

这一天的战斗是残酷的，苏方共死 31 人，伤 14 人。边防军夺回了达曼斯基岛，并挖了战壕，一个加强班一直在那里执勤。

上校阵亡，“秘密坦克”陷落

为防止中国人再次侵入该岛，由亚申中校率领的一个机动分队来到这里，他们共有 45 人，4 辆装甲运兵车，车上有掷弹筒；岸上还集结了 80 人的预备队，并有装甲运兵车，3 月 12 日夜，远东军区第 135 摩步师来到冲突地区，他们有一个摩步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独立坦克营、一个“冰雹”-BM-21 火箭营。

不知为什么，3 月 14 日在该岛执勤的分队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该岛。康斯坦丁诺夫至今保留着当时在岛上执勤的分队队长沙拉金的报告笔录，笔录是这样写的：“3 月 14 日，边防执勤分队听到了对岸中国人的喊话声，后来我们就接到命令，撤了下来”。从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战斗开始前 15 小时下达的。我问过列昂诺夫是谁下的命令，他说是“军区”。但我估计，命令并不是军区下达的。我们走了，中国人又占领了该岛。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怎么回事，但这很不正常。

中国民众聚集在苏联大使馆前进行抗议

3 月 14 日快到半夜时，列昂诺夫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求重新夺回达曼斯基岛。大约 1—2 个小时后，亚申中校率领机动分队到了。战斗开始了，关于岛上的情况并不明了。从最高观察哨上报告说，中国人跑到岛南端去了，占领南端后准备打击亚申的侧翼。后来又有 9 辆坦克前来支援，列昂诺夫发现坦克后说：“我现在去岛上”，说着他就匆忙出发了，甚至没有来得及确定联络信号。边防军虽有无线电台，但他们都不知道频率，坦克去参加战斗了，

我们和它却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人接近了列昂诺夫的坦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辆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挥所，而是返回了哨所。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有人觉得，中国人的坦克开到了我们这边，情况非常严重。列昂诺夫在坦克里受了重伤。此事报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昂诺夫上校。结果，有几次试图冲向坦克都未能成功。

15日夜16日凌晨，师侦察连连长勃尔特科夫斯基率领侦察营救小分队前去营救，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我们想用地雷将坦克炸毁，但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用火箭炮，从乌苏里江岸上发射每枚重达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准。坦克被打歪了，瞄准手已经看不见它了。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

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为什么不讲实话

康斯坦丁诺夫说，对3月2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的宣传是这样说的：“10时40分，哨所响起战斗警报，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进入战备，哨所负责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将情况报告给了相邻单位的布别宁和肖霍洛夫，并报告了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赶走中国人，首长决定……”

是谁在什么时间向什么人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不像上面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这明显是在捏造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向本国人民以及中国人表明，我们的边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实际上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却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时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有军士学校和装甲运兵车参加，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我们占有优势。之所以不提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很少的兵力赶走了中国人。

政府在报道3月中旬达曼斯基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说：边防军把毛泽东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边防军的冲锋受挫，遭受重大伤亡，中国人在人数、技术装备和武器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战斗开始前该岛在他们手上。宣传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规军和坦克的事，对列昂诺夫上校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

和平的努力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 1964 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 1968 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入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

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 1969 年 9 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

现在俄中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不再拥有达曼斯基岛了。它已划归中国,因为它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如果在 1964 年时我们听从济里亚诺夫将军的建议,那就不会发生 1969 年 3 月的悲剧。

苏联人眼中的珍宝岛事件真相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方在达曼斯基岛的武装挑衅是早有预谋的,并经过详细周密的准备。在打扫战场时,苏军发现了中国部队丢弃的中国产轻武器、弹药、野战电话、通往中国境内的通信线路、迫击炮弹稳定器、大量弹片、一些手榴弹和其他物品。

苏联称无边界问题可谈

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剧强化了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国家已被普遍军事化。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奉行“反苏主义”,并将其作为中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因而更加激化了本已破裂的苏中关系。在那时,中国党和国家的所有官方行动都围绕着一个口号,即“苏联——我们的死敌。”

北京领导人的主要矛头指向苏中边界,并在群众中煽动说,“苏联极具侵略性”,“威胁来自北方”,“苏联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等等,人为地制造两国边界纠纷。

俄国和中国在远东的领土划界始于 17 世纪,当时俄国控制了从源头到河口的整条阿穆尔河(编者注:即黑龙江,为武力侵占),从而不仅拥有了左岸的土地,而且占有了右岸(编者注:即中国一侧)一些地方。不过,为完全弄清和明确国境线的具体走向,双方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直到 20 世纪初,俄国和中国之间的领土划分才算总体完成。

苏联认为中国主动挑衅

但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方面在苏联边界的挑衅活动相当活跃。从 1965 年 3 月底起,在未经苏联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占领苏联领土某些地段的企图日益频繁。中国军人和公民也开始示威性地侵犯苏联边界。从 1964 年 10 月 1 日到 1965 年 4 月 1 日,有记载的越境行为有 36 起,参与行动的中国人大约有 150 名。而在 1965 年 4 月的前半个月,越境事件就多达十二次,500 多名中国公民和军人参与其中。

此外,扰乱边界的行动越来越具有挑衅的性质。1965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军人的掩护下,大约 200 名中国人开着八台拖拉机,来到苏联领土进行了土地翻耕。在返回途中遇到苏联边防军巡逻队后,中国军人发生了强制性和欺辱性的举动。

中国政府又加剧紧张形势,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区集结军队,组织了大批所谓“劳动大

军”部队。在这些地方，他们开始建设一些大型军事化国营农场，而它们实际上都是些供军人驻扎的军屯。中国“基干民兵”也大量涌现，被派来保卫中苏边界。

在公安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边境地区的居民也被分成若干治安小组。离中苏边境线 200 公里的范围内被宣布为禁区，并被作为“中国第一道防线”。所有被怀疑同情苏联或亲戚在苏联的人，皆被赶出这一区域，并被送往中国腹地。

至于苏联领导人的立场，他们都自始至终地坚持一个观点，即两个邻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中边界具有永久性条约基础，没有必要重新修订。

中国方面不断扩大侵犯苏联边界的规模，使挑衅活动逐步升级。与上一年相比较，在 1967 年，中方侵扰边界事件增加了一倍多，超过 2000 多次。值得指出的是，侵扰边界事件的数量与席卷全中国的反苏浪潮相关，并直接取决于它的潮起潮落。

边界冲突的规模和频率清楚地表明，北京有意在边境引发大规模冲突。1967 年 2 月，在谈到中苏关系的前景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坦率地表示：“关系可能破裂，战争可能爆发。”同年 3 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指出，除大规模战争以外，“存在着边界战争”，“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边界战争将早于与美国的战争。”

没过很长时间，这些话都应验了。1969 年 3 月，北京的反苏路线到达一个高潮，在苏联边境发起了大规模武装挑衅。毛泽东曾经坦言承认，这将在许多年内引起中国人对苏联的仇恨。

边界冲突终于爆发

1969 年 3 月 2 日和 15 日，在乌苏里江的达曼斯基岛（编者注：即珍宝岛）地区，中国军人侵犯了苏联边界。这个岛属于苏联所有，宽度约为 300 米，长度为 500 米，面积 0.74 平方公里，并在不同季节随江水涨落变化。该岛沿中国江岸一侧延伸，中间与其有一条狭窄的水道相隔，宽度大约为 47 米。而达曼斯基岛距苏联一侧江岸的距离则远得多，大约有 220 米，中间有主航道相隔。

3 月 2 日，以夜色和天降大雪为掩护，中国正规军部队 300 人侵入苏联国界，摸上达曼斯基岛设伏。而在中国江岸一侧，中国军队事先调集了预备人员和火力装备，包括一个装备反坦克炮、迫击炮、榴弹筒和重机枪的炮连。

早晨，苏联边防军的技术观察哨发现，乌苏里江冰面上出现了大约 30 名中国军人。在军官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尼古拉·布伊涅维奇的率领下，八名苏联边防军人朝越境者走去，打算向对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他们远离达曼斯基岛。然而，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中国人率先用自动步枪开了火。同时，岛上的埋伏部队和中国江岸部队也用自动步枪和迫击炮进行射击，对另一队前来增援的苏联边防军展开了阻击，其带队的为下士尤里·巴班斯基。第一个边防队被全部打死，增援的第二队人马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没过多久，在维塔利·布别宁上尉的带领下，一支摩托化机动部队赶到事发地点，从背后对入境者进行包抄。但敌方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60 人的边防部队难以抵挡对方整个步兵营的兵力。布别宁的装甲运兵车被击毁了，他本人也受了伤，几名边防军人被打死。这时苏军增援部队赶到，已经有两个边防哨分队投入了战斗。钻进另一辆装甲车后，布别宁指挥整个部队继续战斗。

这场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进行得非常激烈。附近的苏联村民闻讯后，也前来帮助边防军，阿夫杰耶夫几兄弟表现得尤为突出。重新摆开战斗队形以后，苏联边防军与后来赶到的预备队击退了对方的袭击。然而，胜利的代价也是高昂的：32 名苏联边防军人被当场打死或因伤势过重而亡，14 人受了伤。死者中最年长的为 30 岁，最年轻的仅有 19 岁。

中方在达曼斯基岛的武装挑衅是早有预谋的，并经过详细周密的准备。在打扫战场时，苏军发现了中国部队丢弃的中国产轻武器、弹药、野战电话、通往中国境内的通信线路、迫

击炮弹稳定器、大量弹片、一些手榴弹和其他物品。

1969年3月2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坚决抗议对苏联领土边界的武装入侵，并要求立即开展调查，对挑起事端的责任人予以最严厉的惩罚。苏联方面坚持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苏中边界上的所有越境事件，并强调愿意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中国方面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准备在边境策动新的武装挑衅，并在1969年3月15日得到实施。

在这一天，苏军派出了由一名军官和五名士兵组成的侦察小组，负责瞭望达曼斯基岛南部区域的动静。大约在早晨十点钟（注：苏联当地时间），侦察小组报告说，有越境者从邻国跨过河道登上江心岛。经大体估算后得知，越境人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步兵团，并有大炮、迫击炮和两辆坦克提供火力支援。苏军部队到达后，与越境者展开了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据苏军直接参与者尼古拉·波波夫上校证实，这天的整个冲突持续了九个小时，期间该岛由两方反复易手达八次之多。

与3月2日的冲突不同的是，不仅苏联边防军参加了此次交火，而且苏联正规军也给予了密切协作。苏军一个人数庞大的摩托化步兵团火速赶赴前沿，迅速在达曼斯基岛地区展开，并带去了所配备的全部火力装备。投入冲突的甚至还有一系列其他军事化队伍，但出于保密的目的并未公诸于众。除此以外，苏军还对中方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段，意在诱使敌方误入歧途。最后，当中国人被彻底赶出小岛后，从中国一侧进入该岛的所有路径都埋上了地雷，而与之毗邻的边界地段也被苏联军队严密封锁。

在此次冲突中，苏联边防军死亡17人，其中包括达利涅列琴斯克边防队队长德莫克拉特·列昂诺夫上校。苏军第45军的部队在发动反击时，战斗减员也达到9人。

到1969年9月前，即过了大约半年，达曼斯基岛地区仍然没有平静下来。苏联边防军在周围的山丘上布设了大批火力点，当发觉中方人员试图登岛时，就会定期用威力巨大的“冰雹”火箭筒和122毫米榴弹炮对岛射击。

1969年9月，苏联和中国政府总理在北京举行高级会晤，最终解决了达曼斯基岛危机。期间签署的双边协定规定，两国边界保持原状，不得再使用武力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区的边界形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对苏中边界开展勘界工作以后，乌苏里江中的部分岛屿，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被移交给了中国方面。

4 真相：以小博大豪赌中国的未来

核心提示：如果说，苏联军人作为战争的当事人没有资格对战争的起因做出证词，而多年后这场战争的中方策划者与指挥者的与之如出一辙的叙述，无疑为我们打开了真相之门。这是一场有目的战争，而其目的关乎中国的未来，甚至毁灭。

陈锡联回忆：珍宝岛反击早有准备

提示：根据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

当时，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等，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边防站成立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还成立了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中央军委、沈阳军区强调，自卫还击要严格限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

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极力向苏联解释 这不是战争

提示：周恩来一开始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传言”问题。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他们想从柯西金嘴里听到苏联的态度。周恩来明确暗示，中国没有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和客观条件，因为它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

译者按：俄国《远东问题》杂志 1992 年第 5 期刊登一篇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引文，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教授 C·贡恰罗夫和 B·乌索夫所作，简要地概述了中苏两国军事对抗的升级经过，比较了中苏两种会谈记录说法，并探讨了会谈对形势发展的影响。后半部分是原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A·埃利扎韦京对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回忆。此人在 1968 至 1969 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期，曾以苏联驻华最高官方代表身份直接参加了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举行的会谈。他在回忆中披露了许多在两国官方说法中所没有的会谈内容，从另一个侧面再现了会谈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对于研究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史，对于评价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文章很长，限于杂志篇幅，需分两次刊出，这里译载的是其引言部分。

1964 年是沿苏中边界一线紧张局势逐渐升级的转折时期。这一年 2 至 8 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同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时作出了一项声明。苏联领导对这个声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 1964 年 9 月 16 日，苏联政府就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专门的抗议照会。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的是，8 月 15 日结束的边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而后再没有恢复。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被废黜，其后果之一是，最高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与此同时，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1966 年，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边界，特别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和乌苏里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1967 年，这方面的报告更加令人不安。虽然苏联代表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1964 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据苏联军事侦察机关统计，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部署的军队人数，到 1967 年达 40 万。这些区域还恢复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区。

1968 年 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苏中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像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正如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所证实，从1969年1、2月份起，中国最高军政领导就着手制定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地区采取武装行动的计划【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按照这个计划，对岛区要进行经常性的巡逻，而不是以前那样的周期性巡逻。

据各种情况判断，中国领导人不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达曼斯基岛地区，A·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根据国际法准则，通航河流上的边界走向，要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中国居民很早就在这个岛上从事生产活动。苏方用以说明自己对这个小岛拥有主权的理由是，在1861年条约的边界附图上，红色边界线是沿中国江岸走向的。埃利扎韦京指出，这张地图上的河流是用浅兰色细线标出的，所以很难用划线笔准确地沿河流中心划线。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些地段标出的边界是沿着我们的江岸走向的。因此，达曼斯基岛事件后，我们很难向外国外交官论证我们对这个小岛拥有主权的理由。埃利扎韦京认为，总的来说，苏方“未表现出理智”，硬要控制达曼斯基这个“不适于停靠、无人居住的”小岛。

总之，可以判定，中方从军事上为达曼斯基岛地区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时，曾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周恩来讲的很明确。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强调说，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

可见，在三月初发生流血冲突前夕，中方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它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至于苏联方面，当然它不能不重视乌苏里江地区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据苏联统计，1967年间，发生边境事件两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乌苏里江上的基尔钦斯基岛（即七里沁岛——译者），1968年1月26日在达曼斯基岛发生了严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苏方在这个地区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军事实力和作战准备。然而发生的事件表明，形势发展之快终究还是搞得苏联边防军措手不及。

达曼斯基岛上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对事件的说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报道同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较，则可以判定，苏联边防巡逻小分队，执行把中国军人从岛上赶出去的任务时，突然遭到了对方从准备好的阵地上的射击。

这个悲惨的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的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这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现代火箭炮装置。

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说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设了埋伏，那么3月15日苏方在达曼斯基岛地区组织“报复行动”，则事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W·罗宾逊著《中苏边界争论：1969年冲突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圣莫尼卡1970年版。】其实，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补充一点：这次战斗的发生，对于我们的战士来说是突然的。

如果讲三月战斗的纯局部性结局，那么中方可以认为是他们取得了胜利。3月15日后不久，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达曼斯基岛，苏方对此的反应是很克制的，开始，我们边防军向中国人提出了正式抗议，后来连抗议也不提了。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试图表明的，围绕达曼斯基岛的冲突决不是由双方要控制这个小岛的简单意图引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3月15日的战斗，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规军的大规模冲突靠近了，不能不为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重大变化。虽然我们现在不拥有关于苏中这方面意图的演变情况的较详细材料，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材料，使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

关于中方的估计，可以根据周恩来在一次秘密的“经济会议”上的讲话作出判断。这次会议是在达曼斯基岛战斗后不久举行的。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首先强调指出，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还不能完全转移到发展东部地区方面，以便在那里为这种进攻行动建立可靠的基地。周恩来还强调说，中国不应怕核打击，因为它自己拥有核武器。此外，这种打击的后果会因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被淡化。他还指出，达曼斯基岛事件表明，苏联士兵“不善于”近战夜战，苏联炮兵的轰击“不起作用”。他指出，苏联在装甲技术上的明显优势，可以靠大力发展反坦克武器来消除。

把周恩来的这些论断同中国有关这个题目的其他报道作一比较，则可以说明，决非中国总理的所有论断都可信以为真。从同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在苏中边界地区供职的中国军人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当时中国军人对苏军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很不安，他们在多次观看对方的教学记录片后，对自己的成功希望作出了很悲观的预测。苏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引起了更大的不安。中国军事领导人明白，中国拥有有限核潜力，在两国严重敌对情况下，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最终作出决定，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中止这个国家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计划。因此北京对1968年出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带有指令性质的《军事战略》一书很不安。中国人特别指出了书中强调以下内容的段落：导弹核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在任一有核大国参加的战争中使用，而且是在战争爆发不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有这些事实，以及限于篇幅在这里未提及的许多其他事实，使我们可以断定，周恩来的上述论点，即似乎中国没有理由害怕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优势，未必反映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真实估计，很可能是旨在使听众得到一些安慰和鼓舞。关于苏联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结论，则另当别论。正如我们在下面所要证明的：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个结论乃是中方许多实际步骤的基础。

当时苏联军事领导人很了解中国武装力量的潜力，因为中国武装力量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潜力总的估价不是很高。他们特别指出。从5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领导人很想得到核武器和其发射装置，大大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运输和通讯的投资，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不稳定，苏联军事领导人也很不安。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提出警告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自然，以下情况引起了苏联军人的注意：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而同年10月27日又试验了能载核弹头的导弹。苏联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核力量已经能够执行一定的任务，但他们并没有过高估计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和可靠程度。鉴于某些苏联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核反击，而其力量又很薄弱，至少在1967年以前曾存在这样一种看法：一旦同美国或台湾发生大的冲突，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

然而，中国在人力方面的明显优势，以及它的核力量的逐渐完善，促使苏联军人把核力量作为中国战线上的一种抑制手段。正是中国的这些因素是苏联直至1981年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国人，根据十分清楚的战略原因，在爆炸原子弹后立即承担了这个义务。

关于是否存在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实际计划问题，我们不了解什么具体

情况，但是注意到当时的具体形势和负责制定各种行动方案的军事策划者的思想逻辑，很难说不制定这种方案，把它作为诸多方案中的一种。顺便说一句，在这里指出下面情况是适宜的：70年代，中国人一建造了洲际弹道导弹，就把它对准了莫斯科。

另一方面，从作者同苏联权威军事专家的交谈中可以得出，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如果存在的话（在我们接触的苏联军人当中，没有人坦率地承认存在这种计划），也是向中国人施加压力的一个基本手段。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并没有出现可以把实施对中国的这种打击视作实际行动方案的形势。

就是上面从纯军事角度对形势作出的很肤浅的分析，也表明当时的形势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也给双方的实际步骤造成了明显的矛盾。

实际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领导人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达曼斯基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同时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在上面指出的发展趋势中，第一个给局部冲突造成一定条件的发展趋势，表现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诺夫卡居民点附近的阿穆尔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区和7月8日在阿穆尔河中的戈尔金斯基岛发生的冲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扎兰阿什居民点附近进行的特别激烈的战斗中。1969年夏季形势的可悲特点是，流血事件扩展到西部边界地段，从而覆盖了整个边界线，这无疑给双方都不希望和不准进行的大规模冲突的突然爆发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1969年3月即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表现出来了。

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3月15日达曼斯基岛冲突发生后，苏联外交官真的担心可能爆发新一轮实际上围着使馆进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帅视察了边界，在了解情况后，作出决定：“不必再试验俄国人的忍耐力”。此后好象毛泽东作出了不再进行示威游行的决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频通讯机给使馆打电话，他同埃利扎韦京交谈时说：“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亲自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谈判。我试图用交频通讯机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给我接线，使馆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吗？”由于谈话是公开进行的，自然中国人录了音，把谈话内容上报领导。同一天夜里，苏联驻华使馆得到通知，23点45分苏欧代司长李连庆要召见埃利扎韦京。中国外交官肯定已经了解柯西金的电话内容，他声称，根本不能进行电话交谈，一切通报均需通过外交渠道转达。

埃利扎韦京通过电话做汇报时，知道中国人在偷听。他强调说，在中国，人们对苏中关系现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他着重强调并请求向使馆集体转告以下内容：“莫斯科密切注视着使馆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让你们受欺负，我们有办法保护你们，……”据埃利扎韦京认为，这个声明肯定中方知道，对使馆周围情况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给使馆发来指示，要把所有妇女和儿童撤回国内。我们的外交官商量后得出结论，这个时候应表现出克制和忍耐，暂时不要急于撤退。同时以防万一，使馆要

求中国外交部发给妇女和儿童出境签证。埃利扎韦京注意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明显对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苏联外交官家属撤离北京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几天后，使馆收到莫斯科发来由葛罗米柯签署的“建议”撤退的电报。使馆回电说：不要急于这样做。最后，中央赞成这个方针。1969年5月，葛罗米柯发来电报，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长感谢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模范地履行工作职责和在中国的复杂工作条件下表现出英勇和克制精神”。

双方的这些谈话和行动，实质上是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想法通知给对方的间接渠道。此外，还有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的调解局势的直接倡议。

如3月21日通过电话谈判的尝试失败后，苏联政府于1969年3月29日就达曼斯基岛事件发表正式声明。这个语气强硬的文件，详细阐述了苏联在边界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并建议“在最近”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边界谈判。其中有一句话意味深长，这就是：苏联“坚决拒绝任何人对苏联的土地要求，试图用武器的语言同苏联、同苏联人民讲话，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击。”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多次号召“同苏联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对莫斯科作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这里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指出：他们准备答复苏联3月29日声明。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给中国同事发去照会，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第二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声明说：“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

这个答复是以中国政府1969年5月24日声明的形式作出的。这个声明措辞强硬，其中的一个重要新内容是：“中国人建议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达成协议，说他们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他们建议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线为实际控制线），还说，在任何情况下，边防军都不向另一方开火。中方建议约定将来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强调中国人民不会被“核讹诈政策”吓倒。尽管双方用词具有对抗性，但是这些声明是在通向政治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作者指出，苏联3月29日声明和中国5月24日声明表明，双方都试图不使冲突升级。这些声明是柯西金——周恩来会谈达成一些协议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中国这个声明的第一个正式反应，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苏共总书记尖锐地批评了北京在国际共运中推行的“分裂主义方针”，指责中国领导人实行备战方针。他通报说，苏联收到了中国5月24日声明，苏联领导总的来说是积极对待声明中提出的在边界上停火、避免冲突和进行谈判的建议的。同时他还说，总的来看，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能说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充满“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苏联的领土要求。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5月24日声明作出正式答复，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

对方未立即对苏联的这个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中方对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作出了让步。

不过中国人还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举行苏中通航混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6月18日至8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建议是5月3日由苏方提出的。如果考虑到1967年的类似会议被中断，1968年中方拒绝参加会议，那么这次同意赴会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会间，中方要求承认其在阿穆尔河上和从上斯罗帕斯利耶和卡扎克维切瓦居民点到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还要求承认中国对大乌苏里岛和哈巴罗夫附近的塔拉巴罗夫岛的主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有很尖锐的争论，8月8日，双方终究还能就航行秩序问题达成协议。

所有这些接触，虽然都很重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除军事冲突的问题。如前所述，6至8月间，冲突仍在发生。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次数的日益增多，最终有可能使冲突转

入不同质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苏方采取了一些旨在开始政治对话的新步骤，同时力求掌握外交主动权。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了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1969年7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中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后来，在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指出：“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的信。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这句话证明，苏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则上对举行高级会晤是感兴趣的，但在6月底认为，会晤的迫切必要性还不成熟，立即同意苏联的建议，会使中方处于弱谈判对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边界全线规模比较小的纯军事方面的流血冲突的继续，显然对中方更有利。在这种战争中，苏联常规武器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中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优势。此外，边界冲突不会造成很大物质损失，可以有效地用来动员和联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冲突容易策划，需要控制它们的水平、发生时间和地点，使之成为内部斗争和对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这种局面对苏方是很不利的，为了结束这种局面，苏方打出三牌，以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继续会导致动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相威胁。扎兰阿什湖附近发生冲突后不久，苏方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个论点，并且随着9月13日的临近，逐步加强了这种宣传。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国人开始谈判的三个月最大期限的结束日期。

《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社论是施加这种压力的一个例子，社论批评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其中说：“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发表扎哈罗夫元帅的一篇文章。扎哈罗夫在对日战争时期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这篇文篇详细分析了红军在满洲成功作战的经验，结尾是这样一句话：“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亨利·基辛格回忆录中的一些有趣材料，可以补充我们对苏联在1969年8月下半月至9月初的这方面行动的了解。下面就是他引述的一些事实：

——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使馆代表询问美国同事，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

——8月底，美国侦察机关报告说，驻扎远东的苏联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9月底。

——8月2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私下向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已就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出了试探。

——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同美国同事交谈时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目前的敌对方针继续下去，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注：亨利·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文版第1册第238—240页。】

当然，决不是所有信息都传到了中国人那里，但是他们显然积累了一些很有威胁性的情报，所以急剧改变了自己对高级会晤的态度，并在莫斯科确定的举行谈判的最后期限结束前三天，同意举行会晤。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作者指出，北京安排两国总理会晤，首先是指望降低沿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注：柴成文著《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下同苏联进行边界谈判》，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5—50页。】

预先决定中国人对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的重要因素，是提出这种建议

的方式和安排会谈的方法。1969年9月6日至10日，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参加该国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中方未来得及在代表团访越期间答复这个建议。9月10日，柯西金离开河内回莫斯科。10日夜，中国外交部召见埃利扎韦京，通知他，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这时苏联代表已飞抵塔什干。取得莫斯科对举行会晤的“允许”后，柯西金改变了航向，经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于9月11日上午抵达。

这以前苏中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大相径庭，彼此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尽管如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完全一致的行动。苏中之间还存在通过中国领土用火车向越南运输苏联军事物资的秘密协议。鉴于这种情况，苏方试图利用越南之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如1965年2月，柯西金在往返河内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1966年1月，以谢列平为首的代表团去越南访问，也提出了这种会谈问题，但没有结果。1969年中国领导人同意举行会谈，表明他们对总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很不安。

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倡议明显是由莫斯科提出的，这对中方是有利的。在会谈中，北京从一开始就没有处于弱的一方的地位。会谈建议在机场进行，这一点突出说明了双方关系的“冷却”和访问的不正常性质。看来，这是为了免遭中国领导人中的“激进分子”的攻击，因为他们可能把会谈这个事实看作是“向苏联修正主义者投降”。中国专家在私下谈话中说，周恩来建议会谈在机场举行，是因为柯西金若出现在北京中心地区，不能排除红卫兵的胡闹问题。莫斯科同意这种从礼仪角度看很不体面的谈判方式，证明它对苏中关系现状是何等的严重不安。

在持续3个小时40分钟的会谈过程中，两位领导人首先谈到政治军事形势问题，正是通过这个问题把边界问题提到了首位。这个情况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会谈必然首先要对两国自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到这时已达到顶峰的军事对抗形势作出明确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复原会谈的内容，比较苏联和中国对会谈内容的说法。

首先，我们指出两种说法相吻合的部分：

——周恩来一开始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传言”问题。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他们想从柯西金嘴里听到关于苏联态度的通报。

——周恩来竭力使苏联总理相信，中国不存在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打算和客观条件，试图使柯西金得出，没有任何必要发动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

——中国总理极力为这种论点寻找依据，首先是，中国不具有发动战争的军事潜力。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核计划不具有威胁苏联的性质。

——此外，周恩来明确暗示，中国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它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苏联对会谈内容的说法还是中国的说法都清楚表明，北京领导人认为建立那怕最低限度的防止大规模冲突的保证，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弄清楚苏中两种说法的不同部分，可以补充说明会谈的情况。在苏联的说法中有以下几点是在中国说法中所没有的：

——柯西金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不存在同中国作战的计划，不会采取任何备战措施。

——柯西金认为，中国人确实不准备打仗，因为国内“问题成堆”，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战争。

——周恩来在交谈中两次强调苏联在空军方面具有优势。

——柯西金指出，“美帝国主义”竭力促使苏中发生冲突，以便“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周恩来同意“不能让帝国主义高兴”的意见，并强调说：“美国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是旨在促使我们两国发生冲突。”实际上，这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已经是“大三角”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说法中，有以下几点是在苏联的说法中所没有的：

v——周恩来声明说，党际意识形态论战可以继续“一万年”，但不应损害国家间关系。

v——他强调说，中国对旨在获得附加生活空间的战争不感兴趣，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资源和领土。

——中国总理指出，由于中国核潜力发展水平低下，它没有能力进行核战争。

1966年，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边界，特别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和乌苏里江，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1967年，这方面的报告更加令人不安。虽然苏联代表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1964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据苏联军事侦察机关统计，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部署的军队人数，到1967年达40万。这些区域还恢复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区。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苏中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后，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像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中国人同意举行柯西金——周恩来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苏联的压力，怕苏联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因此在70年代，他们一直强调苏联对他们国家的军事威胁，说“谈判桌上悬挂着原子弹”。然而，两位总理之间的会谈、后来的协议和主要的一点——边界上紧张局势的明显缓和，使北京得出结论：在防止大规模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保证。这个结论使北京得以减少一些军费，并在1974年实行了较大幅度的裁军。

苏联分析家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威胁的严重程度的估计。现在说中国威胁已经不是直接威胁，而是与该国将来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必然加强相联系的长远威胁。苏联在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有些减慢，虽然说仍然是相当快的。总之，建立同中国军事对抗结构的费用，按各种估计，用掉我们两千亿到三千亿卢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双方离开了全面冲突的边缘，使苏中关系从引向灾难性冲突的道路转入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竞争的轨道。

中共九大召开前夕 珍宝岛反击战应时而起

提示：在九大召开前夕爆发的这场战争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

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 1963 年和 1964 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20 页。；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1964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10 月 7 日与崔庸健、10 月 9 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中共中央在 1964 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 年 9 月 2 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 月 18 日至 10 月 12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马齐彬、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2 页……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21 页……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 3500 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 250、255 页……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 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 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 60 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2

页。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

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

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李可、郝生章前引书，第319、320页……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引自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89、190页。

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第一部分，“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引自《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第44、62页。

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

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精心策划的珍宝岛反击战

提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中苏关系史研究，是现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

苏联和中国，都是在二十世纪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关于这两个大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现当代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而关于两国关系的研究，则更是热中之热，难中之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两国间的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后来双方公开论战，乃至后来到了剑拔弩张、流血对抗的地步，其变化之大，实在是太富戏剧性了。由于一个时期相关档案材料一度大多处于保密状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禁忌，这使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维艰；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两国关系的万变之大、之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于是乎，对于两国关系变化的种种臆断和猜测不绝于耳。

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

关于两国关系的出版物，几十年来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关于两国关系种种所谓内幕的演绎本，也是层出不穷。然而，很多相关内容的大量出版物，并没能理清人们的思路，很多读者对于中苏间当时到底发生过哪些事，以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依然是不清楚的。

目前，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出版物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纯学术出版物，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苏联兴亡史论》、《十年论战》等都是难得的佳作，是学者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心力之结晶，引经据典、论述充分。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近年俄罗斯、美国、中国台湾相关档案的开放，中苏关系研究已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于中苏两党问题、两国问题，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问题，对于两国与朝鲜战争的问题，对于两国论战及交恶问题，以及两国在波匈事件中的立场、作用问题，直至两国的边界纠纷、冲突等等众多重大事件，我国的史学研究者都已有全新的认识和解读，应当说是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近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受众往往是高端的学者或专业人员，普通读者往往没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些专著，有的甚至没有兴趣读下去。

而另一类出版物则以通俗见长，写中苏两国关系简直同写小说一样，对于重大事件全无考证便信马由缰、胡编乱造。可读性是有了，但是真实性、可靠性却经不起推敲。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样的演绎作品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纪实”类作品中，这种现象尤其常见。如果真的能“大事不虚”当然很好，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由于近十年来中苏关系的研究进展较快，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是“虚得很”。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就，又往往不是一般的写作者所能掌握的。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一书的必要性所在。

一部走通俗化路线的专家之作

该书的作者何明，是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专家，而他的这本书却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走的是通俗化的路线，但这种通俗化之中又包含着很高的学术水准。全书的语言是娓娓道来式的，如同在讲中苏两国间的一个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但是，书中的内容却吸收了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如，关于朝鲜战争问题，很多人可以说

是耳熟能详，但如果细细考问，很多事恐怕又会似是而非。读过本书，相信很多人会对有关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为什么会出兵以及出兵后中国的得失等种种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作者利用、依据学界大量、权威的研究成果，在书中明确告诉读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即占领了汉城。朝鲜战争是北方政府率先发动的，而且是在精心策划后发动的，这一点学界早有公认，但有很多细节，许多人并不清楚。人们固有的观念总是“南方政府不断进行战争挑衅，北方被迫反击”，或者是“南方坚持武力统一，北方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就出现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其实，早在2000年，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就利用已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具体地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就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另外，对北方政府如何征得斯大林同意并凭借苏联的武器支援发动朝鲜战争等情况，同一时期发表的很多专业论文和专著也都有极为细致的论述和研究。不过这些成果大多局限在学术圈内，未能改变一般大众的固有观念。

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这一细节

十分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的问题。本书一改以往“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说“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并认为“林彪的话不无道理”，这种评价的改变其实包含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进步。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就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林彪一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何明将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不露痕迹地融入了细节之中。

关于“长波电台”的新史识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本书对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如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书中披露，关于“长波电台”，苏联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一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就“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书指出，“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两国间的分歧，其实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陈锡联披露当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一些若干细节

此后，又发生了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

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捧读本书，会发现这样极富戏剧色彩的重大事件比比皆是。历史本身，真是胜过任何好的编剧。

5 余波：核战争没来 尼克松来了

核心提示：核战争并没有发生，中国人是幸运的，当然，也可以说是当时领袖们的洞察力如何地高深。然而，如果联系当时规模宏大的备战运动，恐怕上位者也并不笃定事态会如何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顶级“豪赌”，筹码就是几亿中国人的生命。

新疆铁列克提事件：珍宝岛战后苏军的疯狂报复

提示：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精心准备了一次报复。由于之前相关负责人对情报的麻痹大意，使得中国军队在这场冲突中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个边境巡逻分队，共38人在苏军的伏击下阵亡。

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

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 7000 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 6 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4 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 6 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 20 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 38 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 年 8 月 10 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 月 11 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 月 12 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 月 13 日上午 8 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 37 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乌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毛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毛泽东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势，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

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

足有 100 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 500 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 亿人民 8 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 400 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 320 万。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也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 5000 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 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元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

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 1368 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诸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师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音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师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思量警报后的五分钟。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他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

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珍宝岛事件险些引发苏联对中国核打击

提示：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周恩来的责难

10月19日晚，阎仲川坐在作战值班室继续了解各单位贯彻林彪紧急指示情况。22时左右，黄永胜召见。会议室里坐的仍是昨晚那几个人。还未等他坐定，黄永胜便大声问道：“你们昨晚发的那个讲话稿，为什么叫‘一号’号令？谁是二号？”黄永胜的质问突如其来，阎仲川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回答。稍停，他解释说那只是个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编为一号，以后还发了第二、第三、第四号号令呢！“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呢？”黄永胜又问。阎仲川听出了一点门道：准是有的单位把林彪指示扩散到地方，出了问题。军内问题特别是涉及内密的事项一般不向地方通报，这是常识问题，本不需要特别关照；当然如果预见到可能向外扩散而发生不良后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这次阎仲川确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对此承担责任，吴法宪为他说了一句解围的话：“这事当时我们也没提醒他们。”“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过去的习惯编号方法，用‘参作字××号’就好了。”邱会作也插了一句。阎仲川还是不明白这个编号有什么问题。“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笼统地说了一句。李作鹏一言不发，此人一向话少。没有人讲话了。黄永胜扫了大家一眼，说道：“总理不是叫我们给各大军区领导打个招呼吗？大家分分工，分头打电话吧！”

于是大家纷纷自报单位。无人提到的单位就由黄永胜分配。在打电话的间隙，几个人不时互相交谈。阎仲川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中，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原来他们刚才因转发林彪指示的事情在周恩来那里挨了批评。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

改，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插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19日晚，他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看来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又问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这回黄永胜的粗线条工作作风受到惩罚，他因没有审稿，对周恩来的提问无法解释；其余四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场面极为尴尬。

20日上午，黄永胜把前晚发出的4份电话稿全部要去，进行审查。他看后只提了一个问题：“林副主席的指示原来只有4条，现在怎么弄成了6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心想，你传达的时候，可没说哪些是林彪的指示，哪些是办事组的意见，而且根本没有分条，现在这6条还颇费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说明，黄永胜没再吭声。阎仲川不知黄永胜看过讲话稿后，是否向周恩来作了解释。他认为，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10月19日，苏联代表团按预定计划抵达北京。此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未发现苏方有异常行动。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指示问题，并特意对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又批评了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的指示扩散到地方。阎仲川也出席了会议。他惊奇地发现，已随林彪去了苏州的叶群，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并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突然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从京西宾馆会议之后到“913事件”之前，随着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人们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问题，似乎逐渐淡忘了；在中央领导层，也没听到对林彪的指示有任何非议。

阎仲川的困惑

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阎仲川在“913事件”之前对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一无所知。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有所缓和，但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装的依然是敌情、我情。战备工作无尽无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跟他“路线交底”，也没有人给他“透风”。早年在东北战场，他是直接为林彪服务的精干指挥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林彪的指挥艺术和工作作风，都曾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到总部工作，他从未怀疑过林彪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9月13日10时左右，阎仲川和同是副总长的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

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

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1大家全都愣了。阎仲川的脑袋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转而就总参谋部的当前工作向几名副总长作了指示，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阎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阎仲川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他在总参谋部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转移北京卫戍区3师，由1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专案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既然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专案组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在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干、陈继德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

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专案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的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3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焦点

“913事件”之后，“一号号令”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阴谋活动”，甚至说成是“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主要理由是据说这个号令发布前未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是背着毛泽东干的。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中共中央1971年12月7日印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1972年7月2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第24号文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

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定性未变，但增加了一些情节、过程，同时承认林彪在号令发出后的第二天，向毛泽东作过报告。同前一份文件不同的是，把林彪作指示的时间改为10月17日，再就是把“黄永胜等”也划入了参加“预演”的行列。

是否曾在事先向毛泽东报告，成为对“一号号令”定性的焦点，至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反而无关紧要了。究竟林彪在作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军委办事组和前指发布“一号号令”之前，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说法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913事件”之后的十几年间，从官方文件到各种公开读物，无一例外地断言：不曾报告！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陆续从一些严肃的公开读物上看到，一些过去噤口不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或撰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肯定林彪在向军委办事组作指示前或其同时是报告了毛泽东的。而一些官方史书或材料，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当然也有个别当事人坚持认为不曾报告者，如汪东兴。

试看几位最具权威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有关此事的叙述。

其一，“林办”的秘书张云生，是当面接受林彪指示并负责向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的人。“913事件”后，他长期受到审查。据他在此期间向在专案人员提供的材料说，10月17日下午，他在记录下林彪的口授指示后，即按林彪要求到另一栋房子里的叶群处，将记录稿请叶群过目，同时，建议在发出前应向毛泽东报告，还建议对二炮部队的战备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叶群认为建议很好，又与张一起到林彪处，将张的建议作为她的意见提出。

林彪欣然同意。叶群随即吩咐：由张负责用电话向黄永胜传达；要张将记录稿再抄一份给她，由她用电话传给在武昌的汪东兴，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1988年张云生在他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再次肯定了他在受审查期间的说法。认识张云生的人都说，此人脑瓜儿很灵，记忆力强，他受审查时，距“一号号令”发布仅两三年，他对此事的印象应当是深刻的。一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认为，根据张云生当时的处境，他说话会很谨慎的，林彪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是有据可查的，如果明明未作报告而他却说作了报告，他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林办”另外几位秘书曾在私下表示，根据他们对林彪、叶群的了解和在“林办”的工作经验，他们认为像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这样的大事，林彪是会报告的。另外，据“林办”和军委办事组许多秘书们反映，“913事件”前，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与叶群之间的“热线”是很热的，叶群有事常找“汪主任”商量，林彪要向全军作紧急指示，叶群给汪东兴打个电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将军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作品，其中披露了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该书提到，“两案”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缺少定案的充份证据，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于是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从中寻找证据。对查证的具体成果，该书未作交代，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最后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份”，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参加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14人中，有人后来曾向阎仲川透露，他们查到了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

其三，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长期以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和日常工作、生活管理，经常不离左右，应是最具权威的知情者。但他在“913事件”后，对涉及里边的许多问题长期保持缄默。直到1997年，才由别人代笔，出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中以500多字提到“一号号令”问题，小标题为《林彪的第一号令》。汪文称：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将‘一号号令’）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给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是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汪文与张云生的记述截然不同，何是何非，任人分析判断。但是，看了汪文，不免让人产生许多疑问：

第一，汪文与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提法矛盾。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现在却又改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转报；而且，电话记录稿变成了装在信封中送来的“传阅件”，何况把呈毛泽东一人审阅的文件称为“传阅件”也很外行，但愿这是代笔人因不熟悉党政机关文电分类的格式而出现的笔误。

第二，汪文不知为何回避了林彪发指示时已去苏州，而毛泽东则在武昌，周恩来留守北京这一重大情况。要知道，林彪如果真的先把电话打给周恩来，再在周恩来那里形成“传阅

件”，是很难在当天把它送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泽东手中的。更何况，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林彪曾给周恩来打电话之说。

第三，毛泽东“烧掉”林彪的电话报告记录稿，目睹这一情景的只有汪东兴一人，将此事告诉林彪（还有黄永胜等人？）当然也只能是汪本人。林彪当时是副统帅、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法定接班人，其势如日中天，汪东兴究竟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和语气告诉林彪以及黄永胜的？林彪和黄永胜又是怎样“慌了手脚”的？

第四，汪文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对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的“一号号令”深感不快，于是赶紧“下令撤消了这个命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中央文件和严肃的史书中均无此记载，不知根据何在？事实情况是，“一号号令”在全军被认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所有当年在统帅部经办此事如今仍然在世的人，都可作证。

第五，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既然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很不高兴”、“很反感”，而且这又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却采取了极为克制忍让的态度，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见仁见智说“号令”

“一号号令”是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论断被排除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究竟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却又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事后的结果看，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对中国大举入侵，是由于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有些惊慌失措，因此“反应过度”惊师动众，劳民伤财。有的还以四位老帅对形势的看法与林彪的举措作对比——当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由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研讨，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这是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把握，何况这中间还有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苏中矛盾，苏如进攻中国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必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后果不堪设想。根据上述分析，四位元帅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对“一号号令”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林彪、黄永胜等人和四位老帅代表了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形势的发展证明四位元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而林彪、黄永胜等人的判断和决心都是错误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用是否发生了战争评论采取的战备措施是否得当，看似有理，却犯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并不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上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从结果看，百年备战百年不战，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岂不知，没有这看似多余的浪费，战争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打起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军队里有句流行已久的牢骚话：备战备战，备而不战。这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备战与战争的辩证关系。战争有其特殊规律，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枕戈待旦，准备迎敌，敌人却偏偏不来；一旦疏于戒备，不想打仗，敌人却要逼你打仗。事情就是如此矛盾却又合乎实际。此外，不妨引用一点近年国外陆续发表的回顾当年中苏关系的文章。例如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记述了苏联领导人在60年代如

何准备冒险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材料至今读来仍叫人心情很不平静。当时的在其位者对这类情报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即使是当时基本处于“靠边站”状态的四位元帅，尽管他们判定“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但同时却又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来，林彪就会和突然袭击联系起来？为什么他经常要讲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这大约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马达的刺耳轰鸣和呼啸而下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

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10多万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1961年5月，林彪委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

1962年，林彪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防突办公室”，其任务用林彪的话讲，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根据林彪要求派参谋阎洪淦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动向。林彪交代阎洪淦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913事件”后，阎洪淦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由上可见，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他长期考虑的结果。至于林彪是否像某些评论所说，他发布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敌人马上就要动手？还是听听林彪自己是怎样说的——9月30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林彪与陈毅等四位元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与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之后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913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对军事工作抓得细，要求很严，讲求效率，喜欢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10月初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3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与此同时，他又要求总参谋部情报部，在每天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作一次书面报告。这种做法持续数月之久。

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战备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

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周恩来所说的布拉格事件，即 1968 年 8 月 20 日深夜，苏联出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的事件。苏军在地面部队进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骗手段派空降兵抢占了布拉格机场。这次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周恩来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接过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 1969 年战备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和林彪不仅都在抓战备工作，而且在有些问题上，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号令”余波

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在全军得到坚持贯彻执行。指示下达后，全军紧急疏散的野战部队即达 95 个师近 100 万人，飞机 4000 多架，舰艇 600 多艘以及大量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各种车辆等。由于事出突然，缺乏准备，“三北”地区已近初冬，多数部队都是野营，其艰辛之状可以想见。

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苏方甚至否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因而从一开始便陷于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 9 年，双方代表团长先后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到 1978 年 7 月之后，乾脆无限期休会。不过，谈判开始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有所缓和，边界地区未再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林彪在发出紧急战备指示之后，本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整。但在这方面，来自统帅部的指示却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疏散部队经受了整个严冬的严峻考验，转入新的一年，南方部队又在阴雨连绵中苦捱时光。各种重型装备长期野外放置，维护保养的问题更多。直到 1970 年 4 月 24 日，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以来所仅见。它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在事过之后许久，还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的谈论不仅限于“一号号令”本身，也包括一些被认为与此有关的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问题众说纷纭，难辨是非；还有的问题与林彪的战备指示其实并无关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有二：

一是所谓林彪准备将密云水库放水问题。林彪对此事确曾有所考虑。事情的经过是：1969 年 10 月 18 日晚，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张云生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常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 43 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乾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 21 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地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的意见上

报之后，林彪并无新的指示。“913”后，有人揭发林彪曾轻率地提议密云水库放水，被周恩来制止。有的材料甚至说，林彪连十三陵水库的水也想放掉。十三陵水库名气虽大，却只是一个库容 6000 多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而其实际蓄水量经常在死库容以下。这里的水是威胁不到北京的。

二是北京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问题。有人认为是林彪捣鬼所致。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0 月中旬专门开会研究部署。为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会议决议，10 月 17 日吴，周恩来借许多领导人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之机，在表演结束后，同政治局的几名成员于休息室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要求大家于 10 月 20 日或稍晚离开北京。周恩来并特别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市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要他们安排好住处和生活；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如专机、专列安排，统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

由上述经过可以看出：第一，决定这次疏散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林彪；第二，从时间关系看，作出疏散老干部决定在前，林彪发布战备指示在后，当老干部已接到疏散通知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尚未收到林彪的战备指示；第三，从疏散的组织工作看，总负责人为周恩来，主管机关是以汪东兴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均未插手。此外，再从林彪战备指示的内容看，其中并未提及中央领导干部疏散问题，何况指示也未发给党政系统。因此，北京一大批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与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并无关系。

但在“913 事件”后，先是在官方文件中，继之在大量的各种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不仅把这批老干部的疏散，甚至把办“五七干校”等，都说成是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结果，林彪是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而把这些老干部赶出北京的。近年虽然有些史书已开始纠正错误说法，但收效甚微，不少书刊仍坚持旧说，如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60 年大事记》中，在继续认定林彪是“擅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同时，又特别指出，这个指示“并迫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迁出北京，……实际上是他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此书的编者似乎不知道，在林彪的战备指示发布之前，刘少奇和陶铸以及另外一些受审查、遭关押的领导干部，就已经被中共中央下属的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特别是一位当年被疏散出北京的老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但声称他是受林彪迫害离开北京的，而且为疏散到广州的朱德和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鸣不平，讲了一些他们在这些地方受刁难的情况。由于这位老干部声望非凡，他的说法给史学界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史学工作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公开否定了他的说法。

珍宝岛事件险些引发苏联对中国核打击

提示：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1969 年 3 月 2 日、15 日、17 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 17 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 58 人，伤 94 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

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毛泽东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

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10 月 15 日晚 7 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 130 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 10 月 15 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 4 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 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 2 至 2.5 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 9 月 23 日和 29 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 2 至 2.5 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 300 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 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

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

提示：为了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任最高副统帅的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而这条命令也在后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极大的不快。尽管毛泽东当时对林彪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但这种反应却也给之后林彪与他的公开决裂埋下了伏笔。

难堪的沉默

凡是在 70 年代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揭批查”运动的人，大概无人不知有个林彪的“一号号令”。

事情发生于 1969 年 10 月。“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13 事件”后，这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问题如此严重，自然要认真清查。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人——部队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每个受审查者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与阴谋活动无关，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

己“路线觉悟”不高，丧失革命警惕，未能识破林彪阴谋，盲目执行了林彪指示，客观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边。无尽无休的交代、检查、反省，从形式到内容，竟然惊人地相似，好似有人从中导演。但是，这里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们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对加之号令的结论深表怀疑：说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的，但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领导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关心军事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而且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要求军队的重大工作均须向他请示报告，有时甚至一个营、连的调动都要经他批准。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而且，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毛泽东在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消？特别是在这些受审查者中不乏了解号令产生具体背景和过程的人，面对结论，他们尤感惶惑。然而，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见解和提出疑问，更无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明事实真相，证明这个号令并非什么阴谋。他们深知，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运动面前，这样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弄个为林彪翻案的罪名，其结局不问可知。于是，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沉默。

这是不得已的沉默，违心的沉默，难堪的沉默，可悲的沉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沉默将持续到何时？

评论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略“四人帮”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与林彪虽然都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后，关系已相当紧张。近年关于林彪一些所谓“纪实文学”中屡屡提到的黄永胜秘书李必达遭关押的案件，就是因李偷听了黄永胜与叶群议论江青的电话，给江青写信告发而引起的。这是当时林彪与江青之间关系状况的最好说明。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林彪与江青集团之间矛盾长期聚集的大爆发。从“913”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江青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无忌。在此期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纵“批林”。他们一方面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盖早年与林彪的关系，摆脱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他们自知在军队中缺乏根基，毫无威望，阴谋在“批林”中党同伐异，扩大其在军队的势力和影响，为其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基于这样的动机和心态，他们在“批林”和清查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左做法：对事，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例如，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罪证遭到批判；对人，凡不顺眼的军队中高级干部，则罗织罪名打成林彪死党，予以批斗剪除。在此形势下，对于“一号号令”之类的问题，自然不可能奢望会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按说对“一号号令”之类问题的澄清，也属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此时又出现新的阻力；更何况三人成市虎，众口铄金，经过多年如倾盆大雨式的揭发批判，舆论早已形成；而少数知情者则心有余悸，继续抱观望等待态度。

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到了1986年，具有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对已往“红头文件”的说法提出重大修正。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但是，编者在这一条目的最后还是加了一个小小的“但书”：“这个‘紧急指示’，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对“一号号令”发布的必要性似乎有所保留。为了使人们有所比较，了解该书编者对这一事件记载所作修正的重大意义，这里有必要把1981年10月版的同一著作对此事的表述全文照录如下：“同日（按：指10月17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这段文字最早出自“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事隔5年，修订稿摒弃了原来的说法。走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求实精神和

政治勇气。

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提法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不少领导讲话、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和名人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到“一号号令”，依然大加挞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毕竟不是“红头文件”。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作为史书，必须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本书关于“一号号令”的记述又有新的突破，它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文字完全采用了客观叙事的方法，没有“但书”。

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编写者们如何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去伪存真，坚持据实记述“一号号令”为例，充份肯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些报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一些当年因“一号号令”而受审查者和知情人，更是百感交集。他们总算盼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一天，而这一天未免来得太迟，代价未免太高了。还有一些人则未能等到这一天，他们已经背着“黑锅”，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通过“一号号令”被歪曲和澄清的过程，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历史的正直人们的深刻反思：一个原本并不复杂、不难弄清的问题，为什么竟会被弄得神秘莫测，沸沸扬扬地炒作多年，谬种流传，将一般群众蒙蔽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呢？

“四人帮”之流围绕“一号号令”问题散布的谎言，集中起来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声称，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196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第二，发布“一号号令”是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后不得已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那舆论高度一致的岁月，纵然有人对这两点有所怀疑，也无法探问究竟；以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有谁还会认真查问？倘若知情者也都死了，还不是死无对证！这正是“四人帮”之流自以为得计处。

所幸，时间虽已过去近30年，当年“一号号令”的主要经办人员都还在世，还有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可供佐证，足以提供“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只要不怀政治偏见，人们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感到过去对“一号号令”的不实宣传，是何其荒诞不经。

“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1969后：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要了解“一号号令”的产生背景，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和苏联之间那段不正常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史上，1969年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一年。这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大失面子。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进行报复。8月13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支仅配备步兵轻武器的30多人小分队，在巡逻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有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步兵的苏联边防部队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助战。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兵力和武器装备对比过于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冒险计划。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中国方面及时掌握苏方动向，并认真研究了防范对策。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苏联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的好战形像，而苏联的种种反华侵略行径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动行动。这不但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出于建立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众多的反华叫嚣中，苏联政府于6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最具代表性。“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架势，显然是为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继而苏联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情况是明摆着的，在侵朝战争遭到失败和陷入越南战场泥潭之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在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与此有大不同，60年代后期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冒险性，1968年8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苏联作为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毛泽东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备工作。在军队方面，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特别是调解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维护社会治安，消耗了解放军的很大力量，使战备工作无法落实。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们，无不忧心忡忡。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彻底结束全国的动乱局面。继7月23日针对山西的问题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辞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命令》共提出九项要求，其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作为“造反派”的标志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肆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要求解放军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甚至给予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对惯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没有了上头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严厉打击。这次是自上而下动了真格的。困扰中国多年、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无政府主义，终于得到比较认真的治理。全国的社会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转，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各级革委会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用于加强战备建设。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以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为中心，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却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9月上旬，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主要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问题达成若干口头谅解。但在柯西金回国之后，苏联方面却突然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倒退。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方

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接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庆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9年金秋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北京城一片节日欢庆气氛。

国庆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到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份作战飞机向外转场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1米多长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有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他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阎仲川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

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次提醒他们：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1969年的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度过。但是，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林彪便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又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作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地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的议题已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干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

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中苏关系特别是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不可不加强戒备。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10月16日，林彪前往苏州。

送走了林彪，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于17日前进驻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于16日午夜接到通知，立即连夜向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进驻与军委办事组相邻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是形势使然，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形势险恶，不得不防；其次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决心。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主要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和决心是一致的。他们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防备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事实并不像“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材料说的那样，只是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过高估计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采取“过度反应”。

这就是“一号号令”发布之前的形势、背景。

“一号号令”

10月18日，军委前指驻地。当晚20时左右，住在山下的阎仲川接到黄永胜秘书打来电话，请他立即上山商谈工作。黄永胜住在山上最高处原为林彪修建的一栋房子里，距山下阎仲川的住处约一公里。阎仲川气喘嘘嘘地赶到那里，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黄永胜的客厅坐定。黄的客厅兼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会议室。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阎仲川刚一进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阎仲川赶紧打开保密本。林彪的指示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条措施。黄永胜毕竟不是秘书、参谋，他只记下了林彪指示的大意，因而他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他还要做解释和补充，弄得阎仲川也分不清哪些是林彪指示原文，哪些是黄永胜的话。记录完毕，阎仲川问道：“怎样向下传达？”黄永胜不假思索地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都没有讲话。

阎仲川随即来到设在紧挨黄永胜住处另一处平房里的作战值班室。他要把林彪的指示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可不像黄永胜讲的那样简单，随使用电话“说说就行了”。为了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他必须写出稿子，逐字逐句传达。他略作思考，便找了一名值班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他又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两眼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阎仲川想一想，说道：“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副总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阎仲川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阅签发。值班参谋很快便回来报告，黄永胜的秘

书讲：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身体不适，今天提早服用安眠药睡下了。阎仲川知道，多年来黄永胜全靠药物入睡，用药量很大，不宜再叫醒他。他看了看手表，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已经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传达和落实林彪指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间宝贵，一刻也耽误不得。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向有关单位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阎仲川指示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够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阎仲川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据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

林彪的指示经过黄永胜、阎仲川两个环节的转述、加工，基本精神未变，文字确有不小变化。档案材料显示，张云生传达的原稿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时，讲的是“林副主席指示”，经阎仲川整理加工以军委前指名义发出时，又简化为“第一号号令”；在传抄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把“第一号”写成“第一个”。原指示的正文为4条，“号令”则变成了6条。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将“号令”依次下达给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参谋人员在紧张地传达，阎仲川也在紧张地继续思考。他感到，第一号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合同号令，对于赋有特殊任务的部队、机关和业务部门，还需要分别给以具体指示。特别是二炮部队，情况尤为特殊。黄永胜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只讲了二炮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阎仲川认为：第一，这样讲过于笼统。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第二，虽然二炮部队组建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大家都知道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倘若将它的任务写入合同号令之中，将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他专给二炮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第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

几个号令全部下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阎仲川是一个老参谋工作者。几十年从事作战业务的不平凡经历，使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养成了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今夜的工作，他深感关系重大，但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此事的处理却未免过于简单。黄永胜是他的老领导。1952年华南军区撤消，原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阎仲川是军区作战处（部）副处（部）长。此后，他一直在黄永胜领导下工作。黄对阎的使用可谓放手、放心。阎仲川对黄永胜很尊重，但在工作中他却不惟命是从，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平心而论，黄永胜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指挥果断而不蛮干，长于计谋，善于捕捉战机。

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他表现尤为出色。1947年9月，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时，在上级指挥不尽适当的情况下敢于根据战场急剧变化的情况审时度势，机断行事，在第9纵队的配合下，一周之内两战杨杖子，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给刚到东北担任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原参谋总长陈诚一个下马威，给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来了个开门红，林彪大加赞赏。在辽沈战役，黄永胜率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主力从彰武地区兼程南下，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切断敌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逃向沈阳的退路，为全歼该兵团和取得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再立大功。

1968年3月，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内外关系复杂，工作千头万绪，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黄永胜面临新的考验。对今夜发生的事情，阎仲川深有感触：林彪的紧急指示，是涉及千军万马甚至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黄永胜却只是草草作了交代，也不审阅指示稿，便早早入睡，未免过于草率。阎仲川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无暇再作更多的思考。4个号令下达之后，各单位很快作了反馈，报告请示接踵而来。

从号令发出后的最初反应看，全军各单位执行号令是认真的。广州军区于18日23时15分收到号令稿，军区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丁盛司令员便率领军区前指人员按预定方案进入郊外山区指挥坑道，主管作战的江燮元副司令员则住进作战值班室；军区根据号令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向军以上单位和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发出贯彻号令的具体要求。19日1时40分，便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军委前指作了报告。

“913事件”之后，从“红头文件”到各种史书和消闲读物，在提到1969年10月的紧急战备和“一号号令”问题时，无不大书“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这自然是合乎“微言大义”“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但如果较一较真儿，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欠准确了。

珍宝岛事件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提示：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毛泽东只得设法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由于这次战争危机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才渐渐地打开了。

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

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16]珍宝岛 1969 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 1968 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 1968 年 12 月 28 日，特别是 1969 年 1 月 23 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 2 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 2 月 19 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17]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 3 月 2 日和 3 月 15 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 日的战斗并且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 月 2 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 30 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18]3 月 15 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 T62 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 3 月 22 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 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20]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 15 日凌晨 3 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匈牙利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 月 2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 7 月 26 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

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 15 日凌晨 3 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匈牙利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 月 2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 7 月 26 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飞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34]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35]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36]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形势估计严重，中共中央急谋应对之策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37]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38]而四位老帅7月11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39]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5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40]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

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41]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

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42]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4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4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中苏总理机场缓和，毛泽东怀疑苏联阴谋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讯息。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加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44]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45]，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46]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47]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48]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49]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50]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

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51]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晒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52]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53]

珍宝岛事件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提示：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毛泽东只得设法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由于这次战争危机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才渐渐地打开了。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54]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55]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56]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57]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

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师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师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师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而从四位老师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师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师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师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

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师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师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

因此，老师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师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即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

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 1970 年 2 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 1970 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 1969 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 1970 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 年 12 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 1970 年 1 月 8 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 20 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结语：

珍宝岛事件间接开启了尼克松访华的大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我们站在了核战的门口，甚至已经进入了前厅。虽然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美妙的，可我们依然不得不感谢上天对我们的眷顾。

我们无意责怪谁，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们还是热切地盼望中国永远不要再有这样刀尖上跳舞这样的经历了。毕竟，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押作筹码，绝不是什么美妙的事情。这样的经历有过一次已经太多了。